

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

陈静 保罗·斯宾塞 姜蕴芳 郑昕奕/译

摘要 报告呈现了一项关于中英两国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生态的比较研究成果。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及对45位学者、资助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及文化与技术领域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是首个针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进行的大规模、定性跨国比较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制度与基础设施环境如何塑造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学术实践。

研究发现了数字人文发展中既有的共性挑战,以及明显的差异化轨迹。英国数字人文的发展具有更长的制度化传统——扎根于学术部门、基于项目的创新实践,并与文化遗产机构紧密结合;而中国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以及日益跨学科的学术环境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包括:

- **对数字人文的多元理解:**英国受访者通常将数字人文视为实验性、跨学科且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则描述了一个分散但快速发展的领域,其发展往往受制度约束及务实目标的影响。
- **资助环境:**在英国,数字人文资助通常为竞争性项目资助,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众参与的支持日益增加;中国的资助则更为集中,并与政府重点领域战略保持一致,尤其在文化遗产及智慧技术相关项目上。
- **基础设施差距:**两国在维持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均面临挑战。英国利益相关者强调互操作性、多样性、可及性及可持续性;中国受访者则关注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以及数据标准化问题。
- **职业认同与职业路径:**英国学者对数字人文角色的认知更为明确,但技术岗位的职业发展仍存在困难;中国数字人文身份尚未完全制度化,职业路径正在形成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 **合作机会:**中英双方均对合作兴趣浓厚,但存在语言障碍、缺乏共享平台、跨国资助有限以及研究实践中知识体系不连贯等障碍。

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资助机构、研究人员、大学以及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的战略建议,旨在加强跨国合作,建设包容性基础设施,支持新兴专业人士,并促进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

^{*} 本报告原文为英文,名为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barriers in DH: a UK-Chinese case study*, 发表于 <https://zenodo.org/records/16035797> (开放获取)。此中文版本略有删减。另,可扫描文后二维码获取附录,内含英文版中的图表内容。

基金项目:此项目由英国人文科学与中国学者英国访问联合研究奖(由埃克塞特大学协调)、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留金项[2023]54号)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基于数字技术的艺术方法论研究”(21BA026)提供资助。

关键词 中英比较; 数字人文; 批判性基础设施; 学科; 教育

中图分类号 G1; G32; G53/57

作者简介 陈静(通讯作者),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mail: cjchen@nju.edu.cn; 保罗·斯宾塞,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姜蕴芳(译者),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郑昕奕(译者),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0 引言

近年来,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在推动人文学科(及更广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通过数字工具、方法与研究基础设施, 愈发展现出重要影响力。该领域日益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化文化遗产以及更广泛的数字研究方法交叉, 并不断向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延伸。在正式学术体系中, 数字人文已具相当规模, 但同时也处在其演进的转折点: 它不再是当初那个“年轻的颠覆者”, 却尚未完全成为一个在教学与研究实践上高度稳固的成熟学科。

尽管数字人文具有全球化的发展格局, 但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极为不均衡。一方面, 其在制度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全球差异反映了学术界更为普遍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 数字人文在知识架构的设计与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又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数字化工具与基础设施背后潜藏的语言与文化影响。目前, 大部分数字人文的文献与基础设施仍以英语世界为中心, 主要由全球北方主导。近年来, 一些研究尝试从多种视角回应数字人文发展的全球失衡(Fiorimonte et al., 2022), 并强调数字人文在不同语境下的地方性实践与表现(Risam, 2017)。因此, 我们亟需深入理解塑造数字人文(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数字化研究)的特定国家与地区条件, 以便更好地把握并应对影响全球知识流动的因素。

1 研究目标与影响

2024年, 我们启动了一项比较研究, 旨在探讨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身份建构、研究基础设施与学科职业化方面的态度与实践差异。本研究的工作包括文献综述、两国数字人文相关文献分析, 以及对来自文化领域、资助机构、政策机构、文化遗产组织、出版商及软件开发公司的45位受访者的访谈。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探索影响决定中英数字人文学者研究态度的具体认知、社会技术条件以及体制化机制, 以及这些影响要素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了这些学者所能够开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本报告的具体目标包括:

- 分析中英两国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的发展现状, 并从中提炼出数字介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的启示。
- 审视全球范围内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多样性现状, 并分析实现更具包容性的跨国合作战略所需的条件。
- 考察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已有的合作案例, 评估未来在该领域(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介入人文研究)中深化合作的需求与可能性。

本报告对赞助者、数字化实践者、平台设计者、学术政策制定者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具有普遍意义。^① 更具体而言,它将惠及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正式隶属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虽不直接从事数字人文研究,但其工作与文化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学者。

2 研究背景回顾

此类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即过于内向化,把“数字人文”本身作为一个“品牌”进行讨论。尽管学界对于数字人文在研究与教学中的未来角色仍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当下,数字人文不仅是人文学科更广义数字化研究的有效参照,同时也象征着一种跨国研究实践日益凸显的特征:协作性、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网络化以及项目制。本研究不仅梳理了当前中英两国数字人文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进一步回应了“数字”与传统人文学术实践之间关系的诸多未解难题。

本研究尤其受到近年来关于数字人文全球性与语言多样性之学术讨论的启发。早期的“全球性”数字人文表达实际上深受英语学术传统与西方研究实践的影响,尽管在日本、意大利等国早已有成熟的数字人文社群。对于数字人文中“全球北方偏向”的批评集中在多个层面,包括专业协会内部的代表性不足、基础设施设计的偏倚,以及交流与出版实践中的不均衡(Fiormonte, 2012; Dacos, 2013; Gil et al., 2016)。这些批评催生了“Global Outlook : : DH (GO : : DH) 社群”^②, 作为对包容性与多样性挑战的策略性回应,同时也推动了大量旨在打破文化与语言壁垒的新倡议^③。

尽管近年来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等地逐渐涌现出活跃的国家与区域性数字人文社群,但它们在全球数字人文学术话语中的能见度仍然不足。

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研究,数字人文仍然倾向于从英语世界与全球北方的视角出发,并将其表述为一套“文化中立”的知识实践。然而,事实上这些实践高度依赖于人力或技术层面的计算资源,却很少质疑其工具与数据的获取、设计、分析与传播背后的语境与偏差(Afanador-Llach, 2024; Riande, 2024)。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关于数字人文在不同地区如何生成知识、又有哪些因素塑造其国家或区域特征的实证性研究仍然相对匮乏。早期数字人文话语普遍采取一种“隐性普遍主义”立场,牢牢植根于全球北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的研究视角,几乎忽视了地方语境的作用。

考虑到英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长期参与,相关研究文献的相对匮乏或许令人意外。目前尚无关于英国数字人文发展的权威性历史著述,但其早期奠基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有许多在文学与语言学文本分析方面的先驱者。英国数字人文的历史痕迹散见于更宏观的学科史中,例如苏珊·霍基(Susan Hockey)对“人文学科计算”(当时的称谓)的研究(Hockey, 2004),或朱丽安·莱恩(Julianne Nyhan)和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所开展的大规模口述史工作(2016)。然而,关于英国数字人文发展的过去与现状的实证性材料仍然有限。尽管已有少量相关研究^④, 国家层面的数字人文视角并不常见,且有观点认为,按照学科主题(如数字历史或地理空间研究)而非国家地域来考察研究现状更具意义。然而,若借用朱丽安·莱恩和安

① 我们在这份报告中主要关注人文领域,尽管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越来越多地与社会科学研究及其他领域交叉。

② <http://www.globaloutlookdh.org/>

③ 包括 Global Digital Humanities Symposium (<https://msglobaldh.org>), ADHO (<https://adho.org/sigs/#multilingual-DH>), DARIAH (<https://www.dariah.eu/activities/working-groups/multilingual-dh/>) 这些多语言数字人文群体。

④ 例如,2014年有关欧洲艺术领域研究现状的系列综述:<https://www.hsozkult.de/debate/id/fddebate-132270?title=editorial-the-status-quo-of-digital-humanities-in-europe&rcno=202&language=en&page=11&q=&sort=&fq=&total=434/>

德鲁·弗林的论点——数字人文“缺乏”历史自觉已“阻碍了数字人文对自身及其独特性的理解”——则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理解其地方性条件是提升这种自我认识并更好阐释数字人文对“更广阔知识海洋”贡献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并不旨在构建中英两国数字人文的学科史,但如果能对英国历史上特定事件与计划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朱丽安·莱恩和安德鲁·弗林所指出的,尽管数字人文一直深度参与数字化保存事业,但作为一个学科,却并未能有效保存自身的历史。为英国数字人文撰写一部权威性的历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莱恩和弗林对全球数字人文制度化进程的研究已显示,早期的基础源自一系列逐渐汇聚的学术会议,其中包括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ALLC,后演变为欧洲数字人文协会)的年会(2016)^[3]。

此后,诸如“数字人文学科资源”^①(Digital Resources for the Humanities, DRH,后扩展为包含艺术领域研究的 DRHA)会议论文集(跨越千禧年前后十余年),以及 2005—2008 年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的“ICT 方法网络”(ICT Methods Network)所发布的资源、活动与出版清单^②,都展现出英国数字人文在开放性、协作性与人文导向的数字工具与方法上的深厚传统。1996 年成立的艺术与人文数据服务中心(Arts and Humanities Data Service, AHDS)曾是支持人文学科数字化保存与研究管理的开创性机构,直至 2008 年关闭。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Digital Humanities Institute)等机构的项目网页上,我们仍可清晰看到英国数字人文深植于人文学科的传统^③。

与此同时,近年的一些新兴计划则更多地建立在贯穿数字人文领域的计算脉络之上。2020 年,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人文与数据科学特别兴趣小组发布白皮书,提出如何促进人文学科与数据科学之间更紧密联系的建议(McGillivray et al., 2020)。而与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日益紧密的合作,则推动了众多计划与研究成果的形成,例如英国图书馆的 BL Labs 项目,以及近期的“迈向国家收藏”(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 TaNC)计划^④;再如由爱丁堡大学创意信息学小组(Creative Informatics Group)于 2024 年发布的《数字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未来》报告(Ross et al., 2024),它们不仅汲取数字人文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反哺并塑造了该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学会(UK-Ireland Digital Humanities Association)^⑤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英国缺乏国家级数字人文专业学会的担忧(本研究后续的访谈也会进一步触及此问题)。该学会已经制定了纲要,并发布了一系列过渡性或白皮书文件,重点聚焦于能力建设、学术职业发展、多样性与包容性等方面的挑战。^⑥

中国的数字人文起源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数字人文发展迅速,如今已被广泛视为最具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具有全景视角的研究成果。例如,《世界人文发展报告:中国数字人文(1980—2020)》(Liu et al., 2024);《中国数字人文的争论与发展:新事物还是旧传统?》(Chen et al., 2022);以及《数字人文的理论演进与范式转向: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到“后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夏翠娟, 2024)。最新进展则体现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第一辑)

①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226084631/http://drh.org.uk/>

②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228215215/https://www.methodsnetwork.ac.uk/>

③ <https://www.dhi.ac.uk/projects/>

④ <https://www.nationalcollection.org.uk/>

⑤ <https://digitalhumanities-uk-ie.org/>

⑥ <https://digitalhumanities-uk-ie.org/resources/>

(冯惠玲等,2024)。

总体而言,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可以分为两条发展路径:其一由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cience, LIA)主导;其二则由传统人文学科内部驱动。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发表渠道与研究方法上常有交叉,并且都关注数字技术在人文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但前者更强调数字技术、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知识管理流程;后者则更注重探讨数字方法如何激发新的研究问题,并生成新的学术洞见。

从全球视野来看,与中国相关的数字人文发展并不限于大陆地区。大陆之外许多具有深厚中国学传统的研究中心主持了具有影响力的数字人文项目,并建设了基础性研究基础设施。例如,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①;莱顿大学的 MARKUS 平台^②;台湾大学的 DocuSky^③;以及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地方志研究工具(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 LoGaRT)^④。

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通过与大陆学者的广泛合作,帮助催生了最早的数字人文社群。关于大陆以外的中国地区数字人文的更广阔图景,可参考《台湾数字人文研究发展综述(2009—2017)》以及李友仁(Paul Vierthaler)关于北美与西欧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现状的分析(2018)。尽管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数字人文会议并发表论文,但与国内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国际产出仍相对有限。

在发展早期,中国大陆的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引介西方数字人文模式以及考察海外华人数字人文项目(如王晓光,2010;陈静,2013;Bol,2017)。其中一个持续性的主题是围绕“数字人文是什么”以及“何为‘良好’的数字人文”的争论(如:项洁等,2011;Tsui et al.,2017;戴安德等,2016)。在过去十年间,数字人文在与数字化和数字学术密切相关的图情档领域取得了显著增长(如孙鸣蕾等,2021)。同时,它也快速扩展到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王涛,2015;徐力恒等,2019;邓小南,2021)、文献学(刘石,2022;李斌等,2020;刘石等,2021;赵思渊,2017)、文学研究(诸雨辰,2022;王兆鹏等,2020)、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陈刚,2014;潘威,2018)、艺术史(张彬彬等,2024),以及数据可视化(欧阳剑,2016;严承希等,2018)。这种扩展得益于两本专门数字人文学术刊物在中国的创办,它们不仅显著提升了发表数量与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领域。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迄今为止首个在此规模上对中国与英国数字人文研究者进行比较的跨国研究。我们采用了定性比较的跨国研究方法,结合文献综述与半结构化访谈,邀请了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数字知识生产相关领域的多类学者、从业者及利益相关方(英国 23 人,中国 22 人)。研究设计借鉴了批判性基础设施研究(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与社会技术方法(sociotechnical approaches),关注数字人文网络与基础设施的物质层面与符号层面,并置于不同的制度、文化与社会政治语境中加以分析。

我们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与知名数字人文中心或项目具有明确关联——

- 在数字人文的战略讨论中发挥过作用,和/或在创意与文化产业或学术界推动过战略与创新;

①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② <https://dh.chinese-empires.eu/markus/>

③ <https://docusky.org.tw/DocuSky/home/>

④ <https://www.mpiwg-berlin.mpg.de/FS71/LoGaRT/CN>

- 来自多元机构类型,包括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文化遗产机构、资助机构、政策机构、学术出版商以及在文化领域从事研发的软件公司;
- 特别地,我们还邀请了近年来积极参与两国专业化建设的代表性人士,例如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网络(UK-Irish Digital Humanities Network)、中国数字人文机构联盟(Chines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stitutions)的成员,以及香港的知名数字人文学者;
- 虽然研究对象中“国家级”机构的加入使得样本具有一定的首都集中倾向,但我们仍尽力保证两国样本在地理与主题上的代表性。

访谈分别由研究团队成员主持(中国部分:陈静;英国部分:保罗·斯宾塞),通过 Microsoft Teams 与腾讯会议平台在线进行。访谈问题主要涉及资助策略的影响、学科专业化结构、学术社群与协会的作用、学术生态系统、参与文化、学术评价机制、制度支持与教学项目等方面。

访谈完成后,我们根据伦理申请的要求对访谈文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对两国样本分别进行整理,将回答归纳至若干主题类别,这些类别也构成了本报告的基本结构。我们在对比分析中既关注“共同性”回应,也关注“异质性”回答;同时结合机构类型与受访者角色,探讨他们在描述自身数字人文经验时所使用的语言特征。

4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在设计之初力求具备跨越不同机构类型、角色类别、国家内部区域分布以及学术生涯阶段的代表性。我们纳入了一部分初级研究人员,但由于研究重点之一在于那些在数字人文学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参与的人群,因此在受访者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深学者比例偏高的倾向。

同时,样本中偏向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认同为数字人文学研究者的人群(尽管并非所有人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各国数字人文学计划和网络中活跃个体的关注。尽管我们尝试通过主动联系既有学术网络之外的群体来缓解由此带来的偏差,但仍然存在部分数字人文学领域未能充分覆盖的情况。

我们在区域分布上力求平衡,但在某些地区寻找受访者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网络资源差异,也揭示了该领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这将在后文进一步探讨。尽管数字人文学与更广义的数字化学术之间的边界模糊且高度渗透,我们认为,本报告仍然提供了对中英两国数字化学术现状及数字人文学所扮演的具体角色的批判性评估。我们意识到,将数字人文学共同体视作封闭的生态系统存在风险,但如果在分析中保持谨慎,这种处理方式反而有助于纠正缺乏文化敏感性的“全球化”叙事,并为我们解释区域差异提供必要的参照。

基于本研究,我们认为,未来若能开展更多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深入探讨数字人文学及更广泛人文学数字化研究实践,将有助于凸显全球学术活动的多样性。

5 研究发现

5.1 数字人文学科的现状

在访谈研究的开端,我们首先探讨了受访者对本国(中国或英国)数字人文现状的看法。我们要求他们给

• 尽管如此,跨学科交流氛围逐渐升温,态度上开放,但实践层面仍有限。

相较之下,英国数字人文社群展现出以下特征:

- 以“蓬勃”“活跃”“令人兴奋”等积极词汇描述,但同时存在“身份危机”“有点迷失”“被误解”等不确定感;
- 对数字人文学科的自信逐步增强;
- 被视为具成长潜力,但目前仍属“小众”“规划不足”或“精品化”领域,未来方向未明;
- 以项目与实践为核心,虽对其普遍性意见不一;
- 强调实验性、开放性、社群性与连接性;
- 突出跨学科与协作的特征;
- 逐渐倾向于计算方法、数据与基础设施建设;
- 多元视角被视为优势,但同时也需关注学科多样性。

进一步访谈显示:

- 英国在早期国际数字人文项目中具有先驱地位;
- 首批正式设立数字人文教学项目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硕士阶段;
- 全球首个数字人文学术系设立于伦敦国王学院;
- 然而,全国性投入仍不均衡,整体上更像“实践者联盟”而非独立学科;
- 英国数字人文历史上相对少聚焦文学研究,更深植于高校研究部门,并保持与人文学科的紧密联系;
- 学术培养路径尚不完整,从本科到博士的衔接不足;
- 面对“计算转向”,学界既充满期待,也存忧虑。

(2) 影响性事件

访谈回答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与受访者个人经历的影响,但我们仍认为有必要基于本研究材料,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发展的若干形成性事件进行概览。

中英两国受访者均强调了学术协会、国家或地区性会议、学术项目设立以及数字化工程在塑造数字人文领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英国的发展扎根于更为悠久的制度历史,伴随着多样化的资助渠道、数字化项目的能力建设(早期多与文献数字化相连)及正规化的教学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路径更为近期,特点是快速制度化、国际合作以及新兴技术和政策导向的显著影响。

在英国,受访者将数字人文的起源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时国际文学语言计算协会(ALLC,现为欧洲数字人文协会 EADH)成立,随后创办的权威期刊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现更名为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并归属 EADH)奠定了学科基础。伦敦国王学院开设首个数字人文硕士学位是标志数字人文从“小众”走向主流学术认可的重要转折点。数字资源与人文学术大会(DRH)、2010 年英国主办的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均在社区建设与学科可见度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诸如“旧贝利法庭项目”(Old Bailey Online)^①及谢菲尔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伦敦国王学院数字实验室的成长,确立了数字人文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单纯“服务性工作”的学术价值。资金与数字化倡议同样关键,例如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的资源提升计划、新机遇基金,以及 JISC 对大规模数字化的支持^②,为数字研究提供了专项资助。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建设(如 1996—2008 年运行的英国艺术与人文

^① <https://www.oldbaileyonline.org/>

^② <https://www.jisc.ac.uk/>

数据服务 AHDS 及其学科分支中心——牛津(文本)、约克(考古学)、埃塞克斯(历史)、格拉斯哥(表演艺术)、萨里(视觉艺术),以及文化遗产机构作为研究伙伴的加入,进一步稳固了该领域的发展。近年来,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协会的建立,以及“走向国家级馆藏”计划等大型项目,继续标志着学科的重要进展。

在中国,数字人文作为新兴领域最早于 2009 年被正式提出,王晓光的文章被视为“标志性事件”。其中,CBDB 项目的影​​响被多次强调——其传播与推广不仅通过学者及其私人网络奠定了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基础,也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制度化进程在 2023 年加速,当年 4 月 6 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将“数字人文”纳入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目录,这也得益于武汉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曾三次举办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并设立数字人文微信小组,对学界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数字人文年会”则成为凝聚学界的重要平台,标志着领域的正式集结与联盟形成。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创办的学术期刊,以及数字人文重要文献的翻译与出版,也被视为关键事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出现,被认为深刻改变了中国学界乃至公众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古籍与档案的数字化,以及国家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系统等大型工程,进一步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

(3) 学术领域与论坛

尽管在与数字人文相关的核心学科方面,例如历史、文学与信息科学,中英学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但在具体领域的整合上也表现出区域性的差异,如数据科学、艺术史、语言学与社会科学等。这些差异反映了各自国家独特的学术优先考量与技术参与方式。

中英两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强调历史、文学以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但英国学者更常突出文本研究与语料库语言学,而中国学者则更加强调哲学与社会史。在中国的语境中,数字人文最常与文学相联系,学者们指出:“古代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优于现代文学。”同样,历史也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领域,中国学者观察到历史与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量化和半渗透式”的关系,往往通过数字工具来实现。英国学者对此也有呼应,他们强调历史在数字人文中占据主导地位,指出“如果对全球已经完成的所有数字化项目进行调查,我认为历史将主导这一领域”。他们还进一步强调,英国文学与数字人文的联系非常紧密,尽管部分学者对将数字人文局限于“文本分析”表达了谨慎态度。

虽然两国在历史与文学的重要性方面达成共识,但在对其他学科的强调上仍存在差异。中国学者特别强调信息科学,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尽管信息管理及相关领域在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与 GLAM 部门的关系也同样重要。

此外,中国学者提及数字人文与语言学及计算语言学的交叉关系,其中一位受访者强调,计算语言学“天然适用于”数字人文研究。英国学者则突出数据科学的日益影响,指出学者们正在将“更多计算方法应用于大规模数据”之中。两国均认可技术在这些领域中的日益重要作用,但关注点略有不同。

中英两国在数字平台方面都面临挑战,但表现方式不同。一些英国学者惋惜 Twitter 的衰落,因为它曾是数字人文讨论的关键场域。虽然 Bluesky 或 Mastodon 等替代平台已经出现,但它们尚未完全取代 Twitter 先前的角色,促使学者们重新回归电子邮件与博客等较为传统的交流形式。在中国,国内平台如微信、小红书与“哔哩哔哩”主导着非正式交流,提供了快速互动的机会。然而,尽管数字平台数量众多,学者们指出这些场域往往缺乏传统学术环境中的深度讨论。这导致人们观察到,中国数字人文讨论中的理论严谨性仍显不足,辩论往往缺少在更成熟的数字人文社群中可见的概念深度。

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讨论在成熟的学术会议与学者社群体系中蓬勃发展,其中“谢菲尔德数字人文大会、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会议、牛津与兰卡斯特暑期学校”等构成了交流的核心支柱。讨论常常在正式边缘蓬勃展开,例如走廊交谈、共餐,或非正式的数字侧沟通。这种现象反映了英国更为非正式、去中心化的数字人文

参与风格,强调自发的、生成性的互动。这些非正式交流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语境中至关重要,学者们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坦率的对话。

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则遗憾于缺乏概念上的严谨性,有时甚至将讨论形容为“浅层次”。技术性场所如培训工作坊,反而意外成为提出基础性问题的催化剂。这凸显了中国数字人文在寻求更深入的理论参与与当前以工具为中心的务实讨论之间的张力。大型正式活动往往受制于“面子”的传统需求,从而导致礼貌而表层的交流,而更真诚的对话则往往出现在小型闭门会议或以工具为导向的培训活动中。这反映出中国数字人文社群中的谨慎乐观态度,尽管其发展仍时常受到文化规范与制度惯性的制约。

在两国都占据主导的议题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英国数字人文讨论的核心趋势,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意义既充满兴奋也心存担忧。学者们尤其关注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工具在教学、研究与伦理中的应用。这些讨论反映了英国更为成熟与去中心化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被置于更广泛的讨论框架中,包括数字保存、大规模数据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与伦理考量。英国学者尤其关注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负责任地整合人工智能,同时也意识到大规模数据所带来的挑战与数字人文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涉及研究软件工程师^①以及其他工具与资源建设人员。

在中国,尽管人工智能同样是数字人文讨论的核心,但关注点更多在于基础性问题,例如数字人文的定义、编程是否为必要技能,以及如何将数字人文有意义地应用于文本研究、文献学与历史研究等传统学术优势领域。数字工具在这些领域的整合是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焦点,人工智能既被视为增强研究的工具,也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务实导向也体现在中国学者对更结构化与制度化理论辩论的渴望上,这与英国更为碎片化、自下而上的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将在后文更详细地探讨这一“计算转向”。

在制度层面,英国受益于历史悠久的数字人文中心的遗产结构,同时还有诸如艾伦·图灵研究所“人文学与数据科学小组”这样的非正式网络,它们为学术合作提供了充满活力的论坛。然而,对排他性以及形成“绅士俱乐部氛围”的担忧依然存在,引发了关于数字人文领域可及性与包容性的讨论。在中国,数字人文网络仍处于成型阶段,新兴的制度化平台,如“未来学者论坛”与数字人文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一些企业将数字人文改造为服务,从而模糊了界限并创造了新的讨论空间,但这一趋势也稀释了学术焦点,反映出一种在英国较少出现的混合型商业化。

我们的研究回应表明,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受到直到最近才拥有全国性专业协会这一事实的影响。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协会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以高度包容的方式面向英国与爱尔兰的数字人文社群,根据社群需求发展项目与兴趣小组,并编制了与职业发展、培训和价值传播相关的文档。访谈回应也表明,该协会在跨领域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数字人文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技术辩论(如人工智能)中扮演了角色,而这一点在过去并不常见。一些受访者认为,该协会能够帮助人们在“倡议泛滥”的局面中找到方向,并以“数字人文一站式信息平台”的方式更具战略性地引导活动,尤其能惠及初级学者或首次接触该领域的人们。协会在倡导方面的潜在作用十分明确,例如针对资助机构或高校政策制定者,涉及不同职业类型的流动性等议题。

转向中国,目前有若干新兴组织与非正式联盟在推动本国的数字人文发展。一位受访者指出:“中国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然而,这些组织仍然相对松散与非正式,缺乏强有力的整合结构或统一的方法。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的学者在推动该领域方面发挥了关

^① 见后文对此角色的讨论。

键作用,但一些人认为这些院校与倡议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有学者提到,“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作用极为重要”。这些非正式结构(包括“中国数字人文大会”等会议)在提高认知度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具权威性与凝聚力的组织,以更好地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努力。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缺乏协调,迫切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组织。”

总之,在英国与中国,学者们都表达了对专业协会的需求,以促进更多合作,提供倡导,并为数字人文的未来发展制定明确的战略方向。其关键挑战在于资源有限、领域碎片化,以及在制度与学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5.2 学术身份与数字人文认知

我们的研究发现,数字人文为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职业机会和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但这也带来了某种“双重约束”:在重塑学术身份的自由背后,也伴随着在传统学术结构中处于模糊且常常不被充分重视的位置的挑战(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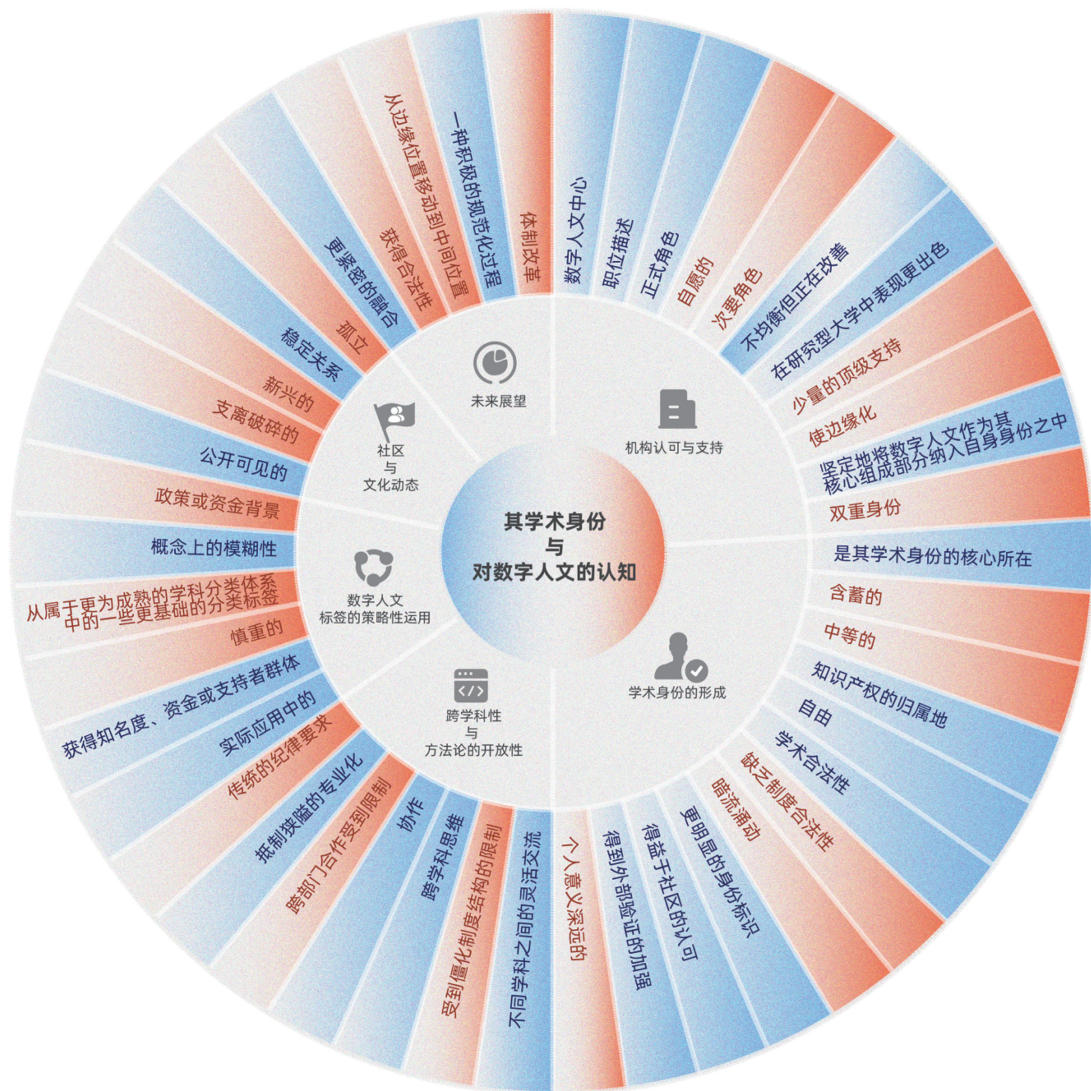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者的学术身份与对数字人文的认知(橙色:中国学者;蓝色:英国学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学者逐渐获得了更多认可,并形成了以数字人文为核心的支持性社群,使得许多人能够公开地以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自我认同。而中国学者虽同样充满热情,却常常在更受限制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使得数字人文在他们的学术生活中更像是一股相对低调的暗流。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数字人文身份不仅仅关乎学科标签,更涉及学术机构中的可见度、个人承诺,以及跨学科开展有意义工作的愿望。随着数字人文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阐述自身在这一领域位置的方式也将随之演变。

在英国和中国学者中,数字人文在塑造学术身份方面所起的作用既多样又常常带有深刻的个人色彩。对许多英国学者而言,数字人文不仅是一种方法或工具,更是他们学术存在的根基。一位学者指出:“我会说它是核心。没有它,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工作……我感兴趣的是数字人文如何能够在广泛的学科范围内促进新的研究。”对这位学者来说,数字人文提供了跨越学科的思想自由,帮助他们抵抗传统学术专业化的僵化。

另一位英国学者则将数字人文视为“学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称其为一种“思想之家”。然而,这位学者也指出了数字人文在概念上的模糊性:“我确实认为数字人文存在一些问题……它已经扩展到涵盖那些实际上属于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的领域,而不是数字人文学科。”这些复杂情感表明,尽管数字人文为他们的学术身份奠定了基础,但它同时也伴随着关于范围和意义的张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在将自己定位为“数字人文学者”时更为谨慎。许多人仍然将自己视为历史学家、图书馆学者或计算机科学家,只是恰好使用数字人文工具,而不是直接认同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反思的那样,他们的数字人文工作往往是自愿进行或处于边缘状态,原因在于缺乏制度性框架:“我的身份是模糊的,缺乏机构层面的支撑。”这常常导致一种“双重身份”——在个人层面上数字人文是令人满足的,但在专业上却缺乏认可。制度支持(或缺乏支持)成为影响学者如何认同数字人文的关键因素。在英国的研究部分,我们观察到拥有成熟数字人文中心的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招聘启事中对数字人文的明确要求也帮助其学术身份获得了合法性,尽管传统上“学术”与“非学术”角色之间的区分及其等级化结构仍然使问题复杂化。^①

而在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缺乏正式的数字人文项目或职称。一位学者指出:“大部分数字人文工作是自愿完成的……没有结构化的资金支持或正式职位。”这种缺乏制度化的状况使得数字人文实践者在学术共同体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往往需要在完成本职工作或政策驱动的任务之外,额外维持数字人文研究。因此,中国的数字人文身份往往是隐性的、次要的,或被遮蔽在其他学科身份之下。

数字人文所固有的跨学科特质,在两种语境中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紧张。一位英国学者强调了这种跨学科带来的流动性:“成为某个特别狭窄领域的专家的想法……从未真正吸引过我。”数字人文提供了跨学科参与的平台,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既是思想上的解放,也符合他们更广泛的学术好奇心。

然而,这种流动性有时也会导致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传统结构化的学术机构中。许多学者通过数字人文深化了对不同学科运作方式的理解,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与工作方式。对许多人而言,数字人文既是一种灵活而令人兴奋的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受到争议或边缘化的身份,尤其当他们所在的院系或国家学术体系并不完全接纳跨学科时。

在中国,个人兴趣也驱动着许多学者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从事数字人文项目。然而,这往往导致一种“身份分裂”:他们可能发表数字人文相关成果,但主要仍然以历史学或图书馆学的身份自我认同。这种双重身份既可能是滋养性的(丰富他们的学术路径),也可能是负担,因为他们必须在不总是奖励数字人文投入

^① 在本报告中,我们希望强调,学术领域的贡献来自于从事各种角色和岗位的人,包括从事非学术工作岗位的人。

的制度结构中来回游走。

一些学者预见,数字人文未来可能会逐渐融入更广泛的学科实践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认为它会变得更加融入不同学科,而不是作为一个边缘存在。”这一预测也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愿景,即数字人文不再需要为自己作为独立身份而辩护,而是能够被主流学术生活自然接纳——尽管我们仍需质疑,数字人文与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究竟会真正融合,还是像当下这样保持互补关系。

“数字人文”这一标签本身的模糊性,是学者们在身份反思中反复提及的主题。一位英国学者直言:“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是否应该称其为数字人文的争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和认同的称谓。”这种务实态度反映了数字人文标签的战略用途——无论是在职业可见度,还是在社群建设上——即便其概念边界仍然存在争议。

在中国,数字人文融入制度结构的进程仍在演变。虽然它目前尚未在顶层战略文件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在个体研究者之间,其价值正在逐渐获得认可。随着认知与支持的持续增长,数字人文有望从边缘走向学术版图中更可见、更具合法性的角色。

5.3 研究资金

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的资金状况较为严峻。我们对中英两国资助背景的研究发现,数字人文工作往往缺乏长期资金支持或可持续发展计划。在英国,学者主要依赖竞争性资助,通常来自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或来自私人及慈善机构,资助的成功取决于项目的创新性、跨学科性和公众参与度。与中国相比,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往往能够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并且在“脱欧”带来暂时性中断之后,仍然从欧洲研究资金中受益。近年来,英国资助模式日益强调主题化和大型合作研究。

在中国,则存在更为集中和战略导向的资助模式,尤其是针对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项目,例如数字文化遗产、智慧城市,或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的结合。这类资助能够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广泛的机构参与,但也可能限制项目范围,减少学术自主性。因此,当英国的数字人文因主题性和项目制模式而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时,中国的数字人文则在自上而下的结构中运行,其优先考虑战略契合度,而非自下而上的创新。

(1) 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

数字人文研究容易获得资金吗?英国和中国的受访者都认为,带有数字特色(尤其是使用计算方法)的人文项目更可能获得资助,部分原因在于数字人文可以在传统人文与“数字化转型”或“创新”议程之间架起桥梁。然而,人们也担心这种趋势可能导致一些研究者“挂名式”使用数字人文标签来获得资助,却并未真正投入数字方法的应用。

在英国,资助已不再局限于“应用型”的数字人文研究(通常是与其他人文学科合作),而是越来越多地支持以数字人文为核心或主导的研究,用于开发新工具、新方法和新型研究基础设施,或开展与文化遗产机构的技术前沿合作。更积极的一点是,如今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比过去更容易担任首席研究员(PI)或联合研究员(CI)。

在中国,则更依赖政府资助项目,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教育部项目,以及与合作企业的合作。数字人文的资金分配依然主要在高校内部进行,而非通过国家层面的专门数字人文项目。少数头部高校掌握了更多的资金渠道,而商业化也带来了新机遇,但同时伴随着学术伦理风险与声誉挑战。一些中国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常常受制于制度约束、短期资助模式以及不切实际的期望,“大规模数字化项目更容易获得资金,而

专门面向数字人文的资助仍然稀缺”。

(2) 资金如何塑造数字人文研究?

在英国,研究资助日益强调“现实世界”或“全球”影响(real world / global impact),或是“可证明的社会价值”(demonstrable value);而在中国,则更强调“新文科”框架下的“可商业化”项目和技术驱动的生产力。人们担心,这种对规模和“新趋势”的强调,可能导致对短期成果的追逐,以及形式重于内容。在任何时期,一些“流行词”似乎对资助决策具有过度影响——几年前是“大数据”,现在是“人工智能”。英国学者也常常感到在申请书中不得不“过度承诺”,这会导致压力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与英国近年来大规模数字化项目逐渐减少不同,中国仍将数字化(尤其是文化遗产数字化)作为重要优先事项。英国的资助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放大边缘群体声音、推动社会公正的研究,而中国的资金则更多集中于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战略目标以及文化遗产研究。两国都越来越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培训。

在英国,资助日益支持数字研究基础设施的发展^①,这一战略与欧洲更广泛的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相一致,推动了 DARIAH、CLARIN 等项目^②的诞生。英国的资助也逐渐将数字人文纳入更广泛的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议程中,例如“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项目,旨在促进公众与研究群体更深入地接触文化和社会数据。

在中国,尽管近年来数字人文项目资金有所增加,但部分大规模项目存在重复建设的风险,被一些学者视为资源浪费。数字人文学者还面临“双重劣势”:他们的计算机技能不及技术专家,同时在人文学术地位上又不如传统学者稳固。这使得他们既无法与行业技术人才竞争,又容易被边缘化,导致有些人利用“数字人文”标签营造一种表层的中介身份,而不是为学科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在英国,教学经费逐渐替代了历史上对短期项目经费的依赖,从而为数字人文中心提供了更稳定的发展基础。而在中国,许多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仍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难以维持连续和系统的研究计划。这使得高校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字节跳动^③等科技公司合作来寻求企业资金支持。一些研究者则通过为图书馆和文化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来获得经费。中国学者普遍描述了一个更为刚性的资助环境:数字化成果很少在基金评审中被优先考虑,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支持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从项目驱动、短期化的资助模式,转向长期的、结构性嵌入的资助体系,并将数字人文视为一种基础性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辅助性工具。

(3) 人们希望看到的资助模式变革

关于未来数字人文研究资助模式的理想变革,受访者提出了多种建议,在许多方面中英两国之间呈现出高度共识。两国学者普遍希望建立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人文研究所需的长期周期、合作结构和技术要求的资助框架。

跨学科边界被认为是一个主要挑战。受访者普遍感到,数字人文研究往往由缺乏相关跨学科评审经验的人来评估,导致人文学者和技术评审者都可能误解数字人文的学术贡献(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历史学家未能从方法论角度承认“数字人文”研究属于有效的历史研究,而计算机科学家则将其中的方法视为“仅仅是应用”)。数字人文研究缺乏合格的评审人员,同时,资助机构和研究评估体系(例如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Re-

^① 见“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https://www.ukri.org/what-we-do/creating-world-class-research-and-innovation-infrastructure/digital-research-infrastructure/>

^② <https://www.dariah.eu/>,<https://www.clarin.eu/>,<https://www.esfri.eu/>

^③ TikTok 与抖音背后的互联网公司。

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 尚未对数字人文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给予正式认可,这被一些人视为一种限制。

在如何重构资助模式的问题上,受访者也提出了多种建议。英国的受访者批评了三年期资助模式的主导地位,建议更频繁地采用其他形式,例如两阶段资助机制,即先设立为期一年的准备阶段,用于概念验证,再进入“主体”研究阶段。中国学者则强调,相较于理工科新兴领域所享有的灵活性,人文与社会科学资助的刚性特征过于明显。英国受访者呼吁提供更透明的同行评审反馈,并建议在申请过程中引入更为稳健的伦理评估环节。

另有受访者建议,在英国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数字人文资助的机构,类似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数字人文办公室的角色,并且能够“贴合数字人文项目的需求与生命周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克服目前数字人文必须依附于“其他人文学科叙事”的局限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初级研究人员和小规模的数字人文项目都在获取研究资助时面临显著挑战,而这种困境因近年来资助模式转向大型项目以及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而愈发严重。中国学者主张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由领导层来驱动;而英国受访者则提倡设立小额资金(约 5,000 英镑)支持初级学者或其他研究者开展探索性研究。开放获取和合作出版的资助模式被认为仍不够成熟。然而,在英国,从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都在推动开放获取出版,而“开放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很可能是围绕“开放数据集”和 workflows,这一趋势与欧洲开放科学议程保持一致。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工具与数字成果的可持续性问题是两国共同的核心关切。在两国学界,都有人呼吁应当更多投资于数字人文的长期发展,而不是依赖那些受短期趋势驱动、只能带来即时效益的资助。

数字人文被认为在与学界之外的合作伙伴(如产业界)建立合作方面具有优势。从英国资助方的角度来看,数字人文在部分人文领域的活跃程度高于其他领域。例如,他们指出,在创意产业领域,特别是在学术研究 with 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实践的交汇处,数字人文研究者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有潜力在阐释艺术、人文学科和文化数据如何“驱动多个行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业包括出版、屏幕媒体、表演和戏剧。

在英国,数字人文相关资助已经逐渐从一次性、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项目型资助,转向更大规模的“战略性”或“集群式”模式,以构建数字技能网络。但来自 GLAM 领域的一些声音则担忧,数字人文研究的快速议程,以及对“持续创新”的不断要求,并不总是能让新思想与新方法真正“落地生根”。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之间建立更具战略性的统筹。

5.4 基础设施

数字研究基础设施(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DRI)通常被理解为由数字平台、工具/方法、标准、服务、人力资源和网络所构成的学术研究支撑体系。与 STEM 学科相比,人文学科的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往往因资金有限而受到制约,而许多人文学者在历史上对其漠然的态度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所使用的基础设施设计中的主动性。过去十年中,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例如 2011 年欧洲科学基金会(ESF)关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报告],以及战略性举措(如泛欧洲研究基础设施 DARIAH 和 CLARIN)。此外,近年来学术关注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基础设施的社会与文化维度,以批判性基础设施研究(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Studies)范式为基础的视角,力图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使用或创造的基础设施如何在塑造

(甚至限制)我们能够生成的知识类型。^①

(1) 对基础设施的认知

我们的研究要求受访者评估本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现状,并提出他们希望未来看到的变化。尽管存在不同的国家语境,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在许多方面共享共同的关切,例如**基础设施碎片化、短期资助模式、技术壁垒以及资源分配不均**。两国学者均强调需要持续投入、更好地将数字工具整合进人文研究,并建立更为标准化的平台,以促进合作与提升可及性。

当然,也存在一些差异。英国受访者更多关注如何扩大研究基础设施的可及性与教育推广,如何应对法律、伦理与环境挑战,以及如何在不同机构之间实现内容的开放获取与互操作性。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强调培训缺口,同时在**凸显发展不均衡**时,会特别置于**地区差异**的语境之下。位于城市中心的一流大学通常能够获得更优质的资源,而较小的院校及农村地区则资金不足。尽管大规模数字化项目正在推进,但许多档案仍因版权问题与政策不一致而难以获取。

(2) 基础设施模式

在两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存在哪些基础设施模式?英国受访者强调了研究基础设施发展的多个关键阶段:从早期的资源建设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与工具方面的专业知识),到战略性的能力建设项目(如 AHRC ICT Methods Network),再到国家级数据存储服务(如“牛津文本档案库”Oxford Text Archive,现由语言与语言数据服务中心 LLDS^②托管)。1996年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数据服务的建立,被许多受访者视为关键里程碑,而其在2008年的解散则导致研究基础设施与数据管理在数年间陷入碎片化支持状态。从资助者的视角来看,近年来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加大了对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涵盖艺术、人文与文化遗产领域,例如“保护与遗产科学研究基础设施”(RICHeS)、“实时融合屏幕技术与表演项目”(CoSTAR)以及“艺术与人文数字创新与策展基础设施”(iDAH)等计划。

不同英国利益相关者之间普遍达成共识,即需要更具整体性的国家层面方法来推动(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发展,以打破孤立的研究“孤岛”,促进合作并扩大访问范围,使其超越少数训练有素且资源丰富的研究中心与机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中考量数字工作,并将数字方法与工作流“嵌入”人文研究实践,重点放在研究数据管理上,以支持数据集的发展、再利用与长期可持续性。

在如何降低数字人文研究的准入门槛方面,虽然存在共识,但缺乏统一的实现路径。有学者呼吁建立一个通用工具箱,使任何人文学者无需大量资金或机构支持即可便捷获取数字方法与工具。一位学者指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云端研究资源来使用工具,而不是依赖本地电脑运行(往往面临**安装与安全**问题),并能按需访问广泛的工具资源。一位资助战略高层提出,应当打造一个“更宏大、由学界主导”的数字学术实验室版本,类似于Gale与ProQuest所提供的平台,即不仅能访问经过筛选并适配特定研究项目的内容,还能提供文本挖掘与可视化工具(同时为熟悉Jupyter Notebook等在线交互式编码环境的研究者提供编程式访问)。在这种设想下,研究者面对的不仅仅是“被动的存储库”或数据集,而是**拥有内置工具的研究基础设施**,使其能够对广泛的人文材料进行复杂分析,而无需在本地设备上**进行复杂安装**,或依赖难以获取的技术支持。

英国受访者还特别提到其在欧洲区域性研究基础设施(如DARIAH与CLARIN)中长期的参与,这些项目显著影响了英国数字人文的格局,使英国研究者能够为跨欧洲的数字人文研究与教育贡献力量。

^① <https://cistudies.org/about/>

^② <https://llds.ling-phil.ox.ac.uk/>

中国受访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概念在该领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及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平台对中国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例如哈佛大学的 CBDB、莱顿大学的 MARKUS、上海图书馆数据库、中国古籍数字化影像总目录、“籍合网”“搜韵”以及“识典古籍”等。若干受访者指出,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在历史上较为常见,部分原因在于机构间竞争,而更大程度的合作能够帮助最大化有限资源的利用。同时,普遍认为缺乏开放数据集与 API 阻碍了合作,亟需更强有力的数据共享框架,以充分释放现有数字人文研究与创新的潜在价值。有受访者认为,这也有助于提升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国际能见度。

尽管存在强烈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受访者同时强调需要关注数据的“验证”(validation)与“数字批评”(digital criticism),即数据如何被创造与使用。在一位受访者的话中,“基础设施的工作就是提供学术共同体的互信与互认规范”。部分学者指出,中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在“资源发现”机制上仍存在不足——有时确实存在优质资源,但缺乏足够的信息帮助用户定位。

研究参与者还指出了中文处理中的特殊挑战,尤其涉及古籍汉字。这包括获取原始数据集的难度,从而需要进行大量人工 OCR 校正与标注。学者们认为,还需要更多工作来处理已不再使用的字符,同时在不同工具与平台之间的字符处理标准化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博物馆数据在标准化方面面临显著挑战,因为其格式分散且异质化;相比之下,图书馆在标准化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

最后,受访者提出了国内与国际基础设施之间的张力问题。但同时,他们也高度认可基础设施在“记录、恢复、传承、传播、衍生与转化历史文化资源与人文学术知识”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能够连接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并与 GLAM(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与图书馆)部门合作,将大规模的历史与文化内容转化为“极为丰富的数字产品与应用”,其价值远超各部分的总和。

结论

两国学者在共识中强调,数字人文在构建新的研究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这也是生成新知识的重要前提。中国学者尤其强调**建设国家级数字平台的重要性**——例如大规模档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以及多模态数据库——以促进长期合作研究与文化传承。这些基础设施不仅被视为**技术资源**,同时也是**定义可生产何种知识的认识论环境**。学者们还建议改进资金模式,以平衡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并呼吁建立标准化数据实践,以应对数据库之间的不兼容问题。

英国学者同样重视基础设施,特别是开放获取存储库与跨馆藏研究的相关努力,并常常将这些工作置于**透明性、数据伦理与学术劳动的讨论语境**之中。他们更倾向于倡导**模块化、联盟式与项目驱动的平台**,以支持资源共享、批判性再利用与解释的灵活性。尽管基础设施在两国都被视为创新的重要场域,但英国学者更常从社会—技术基础角度加以批评,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强调其在国家文化发展与机构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5.5 数字人文的制度化

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发展在结构层面均面临挑战,但其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在英国,数字人文存在多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作为**独立的学术院系**、作为**跨学科中心**、作为“**实验室**”、作为**其他人文学科院系内部的研究领域**,或作为**其他单元(例如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受访者指出,英国“长期存在的数字人文中心与院系”使该领域在英国具有更高的能见度——因为这确立了数字人文从事严肃且有意义的学术研究的认知,并帮助其获得了更强的制度支持。尽管部分数字人文机构相对稳定,但其他受访者认为,在大学结构中的边缘化位置导致其角色并未得到充分理解,从而容易受到制度性变动的冲击。

本研究给出的观点是,英国学界存在一种**结构性分化**:少数拥有相对充足资源的院系或中心已实现了“某

种临界规模”，能够因此维持数字人文的学术形象与研究活动；而在大多数大学或其他机构中，数字人文工作仍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这提示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如何在制度与个体层面支持处于不稳定条件下的数字人文研究。

即便在条件较好的机构环境中，研究人员仍可能感到困惑。一位来自国家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学者指出，尽管该中心的使命宣言强调其“旨在鼓励跨学科以及跨部门合作”，但现实中“学院和大学的学科壁垒一直妨碍这种合作”，其原因在于制度流程缺乏跨机构规划机制，且相关表格无法记录跨机构的合作。中国学者同样强调“小规模社会网络所构建的学术共同体(或许是非正式的)”的重要性。

两国的受访者普遍认识到，现行的学术结构常常深陷学科壁垒，这并非促进真正跨学科合作的最有效方式。

多数英国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的机构总体上对数字人文是支持的，即便对其的理解并不深入：“他们大致知道自己想要一些数字化的东西，但并不真正清楚那是什么。”关于哪种制度模式最有效，学界存在持续争论，受访者分别强调了不同模式的优势(例如院系模式的稳定性与中心或实验室的灵活性)。整体印象是，英国的数字人文目前在多样化的制度语境下运作，若推动更为同质化的模式或许能带来一定成效，但“一刀切”的策略很可能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描述了一个数字人文中心与实验室快速增殖的景象，但往往“只是一个名号”，其实际效能存疑：“在一些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之后，我并不确定它们是否真正运作并发挥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如此。”中国学界高度强调“实验室”和“基础设施”的需求，理想状态是“一个能够直接访问所有资源的实验室”，既支持硬件，也支持数据。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组织“仍然由科研机构主导”，或者仅以“虚拟机构”的形式存在，部分学者希望这些机构能够“更具远见与雄心”。此外，中国还在建立数字人文全国性学会方面面临挑战，有学者指出：“目前并没有全国一级学会来推动数字人文发展。在中国实现这一点也很困难，因为现在要建立一级学会本身就非常艰难。”

5.6 职业与角色

在中国，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是数字人文专业化的一大障碍。在英国，情况则更为复杂：沿着正式“学术”路径发展的学者相比于从事“非学术”合同岗位的人具有显著优势。两国的一些受访者都认为，进入数字人文领域往往是偶然的，而非有计划的选择。一些英国学者认为从业者是通过接触数字工具而“偶然进入”数字人文，而中国学者则将数字人文描述为仍处于“实验阶段”，因此对新毕业生提供的指引有限。近年来，英国无论在高等教育机构(HEI)还是非高等教育机构(如图书馆)中，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带有“数字人文”头衔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数字人文的身份认同。然而，也存在担忧，即“数字人文”在工作职责中的定义有时含糊不清。

在英国，数字人文岗位最常见于学术院系，而非图书馆，这与美国模式形成对比：“英国与美国不同，我认为英国的大多数数字人文岗位仍然设置在学术院系。因此，‘某某学科与数字人文讲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式。”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院系锚定使数字人文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研究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支持服务：“大学并不太会期待设立一种服务部门，其唯一职责就是为数字项目提供类似IT的支持。”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该领域缺乏明确的职业路径和稳定的身份标签，许多人“不确定自己是否算作数字人文学者”，并表示“我并不觉得这里存在一个清晰的结构”。职业晋升往往灵活却也充满挑战，尤其是对技术人员或专业服务人员而言：“大学的合同体系和薪酬等级制度，使非学术人员的职业晋升极其困难，这反过来

又导致难以留住优秀的技术人员。”在一些机构内部,晋升还常常受到传统评价标准的制约,这些标准并不总是承认数字成果:“人们并不理解,一个数据库、多个数据集以及一个工具的工作量,相当于甚至超过写一本书。”尽管如此,随着更多数字人文团队和中心的建立,该领域仍保持乐观氛围,并因其“新兴性”而拥有更多试验空间,能够发展新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数字人文相关岗位仍在不断涌现,且往往依附于图书馆、博物馆或传统人文学院系的既有职位。学者们普遍感受到对“什么是数字人文岗位”仍缺乏明确界定:“作为数字人文的本科专业,究竟应该学习什么?”以及“评价与晋升缺乏清晰机制;数字人文项目需要新的机制”。大多数数字人文毕业生进入图书馆、档案馆或高校教师岗位,从事数字化、数字保存或数字资源管理的相关工作。中国的数字人文就业市场被描述为“实验性”和“不确定性”,在产业中几乎没有专门岗位:“目前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可以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岗位组合,但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类似机会。”学者们期待,随着该领域的发展,未来会出现更多专门化与被认可的岗位,既涵盖学术界,也涉及数字文化产业。

正如前文所述,在英国,非传统学术路径的从业者在数字人文中面临更大挑战,但在数字人文语境下^①确立“科研软件工程师”(Research Software Engineer, RSE)及其相关岗位的框架,是英国数字人文共同体的重要贡献之一。该框架推动了对技术岗位在研究项目中贡献的认可,特别是承认这些工作本身构成研究。然而,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以确保这些角色获得应有的学术认可——例如,如何确保科研软件工程师能够有效利用这种认可来管理自己的职业发展;英国现行的大学体系仍然阻碍这一类别人员的晋升。

(1) 制度障碍与参与文化

英国和中国的学者都在维持广泛而包容的参与方面面临挑战。英国学者担心“隐性工作”(hidden work)以及“需要主动构建”网络的必要性,而中国学者则指出“制度性障碍”,并提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纯粹的、全面的合作”,以及“数据开放极其困难”,这些都构成了重要的障碍。

英国学者在历史上一直拥有较强的参与文化,但这种文化有时因缺乏英国本土的专业协会而受到阻碍。我们的研究显示,诸如两年一度的数字人文大会和牛津数字人文暑期学校等活动在强化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专业协会的成立,该领域开始变得更加连通,并向比以往更广泛的人群“开放”。

参与往往植根于与母学科的紧密联系,学者们能够“把自己视作一名古典学者或其他学科的成员,并成为该学科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该领域也有欢迎那些不自我认同为数字人文学者的传统。英国语境高度重视跨机构合作,尤其是与大型 GLAM 机构的合作,并支持多样化的知识形式——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与英国研究型图书馆联盟(RLUK)的合作非常有益,它承认并肯定了不同知识形式的学术和学者的价值”。英国学者为拥有“世界上最开放、最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研究文化之一”而自豪,但一些人也指出,参与常常集中在数字人文研究者的需求上,而未能真正赋权公众,有时参与被理解为:“公众能为我提供什么?公众能为我提供哪些信息?”而不是“数字人文的方法如何能帮助公众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作型博士奖学金和跨学科项目被认为是积极的案例,但仍有人担忧数字人文工作“过于聚焦于数字人文自身的需求,而不够向外延展”。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描述的参与文化更多是由个人驱动的,但也深受等级制度和集体组织的影响。许多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文参与仍然主要由个人兴趣驱动”。然而,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障碍依然存在:

^① <https://github.com/kingsdigitallab/sdlc-for-rse/wiki/Research-SoftwareEngineering-roles>

“在国内,学者们仍然存在不愿参与的情况,受到职称评定或学术追求的压力。”尽管如此,团队合作和集体组织在大规模项目中日益重要:“中国无疑仍然是集体性的。国家也在倡导所谓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①等级结构普遍存在,有些项目“往往由一位学者主导,其他学者则协助其工作……一般是围绕某位著名或深耕人文学科的学者的研究需求来开展”。合作往往是非正式的,并基于个人网络:“仍然更多是小团队的合作……学者的个人关系网络更为重要”;“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个人驱动……但这种动力的持续性和研究水平可能存在一定局限”。

(2) 职业发展路径

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职业发展路径呈现出制度差异性、流动性,以及职业身份持续协商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显示,该领域需要更清晰地阐明其所能促成的学术发展与职业历程。由于传统的学术路径相对稳定且广受理解,人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非学术”数字人文岗位与角色上。与美国关于“Alt Ac”(替代学术职业)现象的讨论相比,英国的相关辩论在语气上更具功能性,主要围绕科研软件工程师(RSE)这一角色展开。该角色旨在为技术岗位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强的职业身份和更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然而,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一位受访者指出,从事计算机科学的RSE“拥有更加结构化的职业路径,且通常薪资更高”。尽管如此,建立RSE(以及科研软件分析师等相关职位)框架在推动英国数字人文中技术类岗位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住技术人员的难题。我们的访谈表明,未来还需要更多努力来探索学术数字人文与GLAM领域中技术/RSE岗位的差异,并可能推动更好的一致性。

在中国,数字人文的职业路径尚未成型,并面临自身的挑战。大多数数字人文相关职位出现在图书馆、档案馆,或作为传统教学和研究岗位的延伸。在这种语境下,“从事资源建设的岗位也是数字人文岗位”“负责数字化工作的图书馆员也被视为数字人文工作的一部分”。目前在产业界或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专门的数字人文职位,并且“就业市场对数字人文尚无清晰认知”。一些学者对新兴数字人文项目的快速建立表达了谨慎担忧。同时,也存在对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感,例如,“首批数字人文毕业生正在进入就业市场,而其中许多人来自学术声誉尚在发展的院校”。不过,也有学者更为乐观,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是“其他岗位的一种迭代或升级,一种进化状态”,并设想未来数字人文毕业生能够“赋能各种传统行业”,并在“数字文化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受访者普遍表达了对“学术界能够认可数字人文学科与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的渴望,以及对建立“专门的数字人文职业体系和适用于数字人文教学的评价体系”的期望。

5.7 数字人文研究评估

(1) 评估现状

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受访学者均强调,数字人文研究的评估依旧深受传统学术框架主导。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评估体系高度依赖于CSSCI收录期刊^②的发表情况。这种以期刊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使得数据库、工具或可视化成果等创新性的数字人文产出难以被纳入主流学术成就类别。在英国,定期开展的全国性研究评估,即研究卓越框架(REF)^③对高校战略、声誉和经费分配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数字人文研究往往在高校提交REF影响案例时极具吸引力,但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也折射出人文学科在更广泛范围内评估创新性、跨学科数字成果时的困境。

① 这是指中国教育部2022年的一项政策,该政策主张在机构层面而非个人层面对研究进行战略性规划和协调。

②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https://cssrac.uju.edu.cn/cpzx/zwshkxywy/index.html>

③ <https://2029.ref.ac.uk/>

中英学者的共同担忧在于:缺乏专门针对数字人文的正式评估机制。英国学者指出,REF 并没有专门的数字人文评审小组,导致相关成果被分散到不同学科单元中,并由缺乏数字人文方法论背景的评审人进行评估。这种分散不仅削弱了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整体成就感知,也容易造成对其学术价值的误判或低估。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的研究通常由对数字人文不甚了解的人来评估,这意味着他们既不会真正指出我工作的不足,也不会支持我认为最值得被认可的部分。”中国学者则表达了类似的忧虑,指出跨学科或数字化产出的评价政策不明确。在缺乏可跨人文学科普遍适用的基准或量表时,创新研究往往被边缘化或误读。

虽然英国部分高校已尝试为 REF 中的数字成果提交提供内部指引(Ciula. et al., 2025)^①,但中国学者普遍反映缺乏相应的政策框架与技术评审规范,研究人员不得不在模糊的评价环境中摸索前行。尽管一些国家已提出数字人文或更广义的数字学术评估框架,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可被广泛采用的国际通行标准。

中英学者共同的挫折还在于:难以找到合格的评审人。缺乏专门的数字人文或跨学科评审专家,往往导致评审过度依赖传统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未必能准确把握数字项目的方法论严谨性或学术贡献。这种评估错位不仅可能令研究者对非传统研究路径望而却步,还可能进一步固化保守的学术文化。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特性和动态技术范围使得难以为 REF 或其他评估(如科研资助评审或高校内部考核)组建具备充分专业背景的小组。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近年来尝试引入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参与资助评审,受到学界肯定,但也有受访者提出“我们完全可以更具想象力,拓展评审人来源,以适应不同的评估场景”。

(2) 研究结果

英国的 REF 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传统成果评估机制,且在实际提交时,这类成果往往能获得积极评价。然而,受访者普遍对高校内部在成果上报前的预评估过程表示不满。有学者认为,数字项目常令高校高层管理者感到不安,因此学者面临来自规避风险型管理者的压力,被要求提交更为传统的成果(专著与论文),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一篇好文章是什么样子,但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数字成果是什么样子”。

中国学者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学术文化高度依赖专著出版,而大部分非传统成果并未被纳入官方评价体系。因此,除非研究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挂钩,否则仅凭数字人文贡献,学者在职称晋升或科研经费申请上会面临更大阻碍。这种状况尤其打击早期学者的创新动力,他们更依赖公认的成果类型来获得晋升与职业稳定。

由此,投入于数字建模或工具开发的大量智力劳动常常在评估过程中得不到承认。这种对新型学术成果的忽视,不仅阻碍了个人职业发展,也削弱了数字人文在以文本与印刷出版模式为中心的学术文化中的合法化进程。

类似地,无论在英国、中国,还是更广泛的学术环境中,软件或数据作为成果的学术地位依然未被充分理解,这对高计算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3) 数字人文评估的未来

英国学者指出,开放科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学术环境,开放数据、开源代码、数字工具以及研究过程中各阶段产生的数字化成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③ 随着英国及欧洲其他资助方对开放性与再利用的强调,大学也逐渐转向保护与展示数字人文项目。然而,学者们依旧希望拥有更多的实验自由和更快的出版节奏,因

^① <https://www.mla.org/About-Us/Governance/Committees/CommitteeListings/Professional-Issues/Committee-on-InformationTechnology/Guidelines-forEvaluating-Digital-Scholarship>, <https://coara.eu/>

^② 尽管近年来开放式人文数据的概念越来越受欢迎,见:<https://openhumanitiesdata.metainl.com/>

^③ <https://transformations.episciences.org/>

为现有体系往往抑制创新。中国学者同样认识到数字方法的变革潜力,但普遍感受到制度运行缓慢和期刊文化保守所带来的限制。出版规范缺乏开放性,技术文档标准的缺失进一步制约了创新。在两国语境下,学者们都呼吁构建一种能够重视实验、支持开放传播并能反映数字时代学术工作演变特性的研究环境。

5.8 教学与训练

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数字人文研究,而非教学。但在简要涉及教学的部分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当前所从事的数字人文教学类型、他们认为数字人文课程应当涵盖的主题,以及他们希望在教学方式上看到的改进。我们认为,未来若能在不同地理和行政语境下开展更深入的数字人文教学比较研究,将会颇有价值。

(1) 数字人文教学的现状

数字人文在英国的发展,重要推动力之一是对教学项目的投资,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在硕士阶段的课程建设(英国首个数字人文硕士课程于2002年开设)。目前英国尚无本科层面的数字人文专业,但自2005年起,已有若干数字人文博士项目(McCarty,2012)。

本研究确认,这些课程项目的发展对数字人文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首先,它们帮助数字人文在机构层面上确立了学术存在感,无论是作为独立院系还是研究中心。其次,它们提升了数字人文在整个人文学科体系中的学术地位,使其日益被视为严肃的研究领域。第三,它们通过回应不同层次、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学生的实际需求,使学科保持“新鲜感”,并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数字人文的社会与教育角色。最后,它们逐渐培养了未来的数字人文学者,并提升了相关专业领域对数字人文的认知度。

然而,目前尚缺乏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完整学术培养路径。一些受访者因此倡议开设数字人文本科课程,以打造更连贯的教育历程,并构建更稳定的数字人文职业发展通道。同时,也存在对博士培养的担忧,尤其是偏重实践或技术的数字人文博士学位,因其挑战更大,反而吸引力不足。

近年来,英国在课程去殖民化、促进多元与包容方面已做出诸多努力,但在课程国际化及跨文化意识培养方面关注较少。考虑到英国数字人文学生群体往往高度多元化,一些受访者指出,他们的课程可能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与中国数字人文进行交流,以回应众多中国学生的学习需求。

如同研究领域一样,数字人文教学在机构层面也存在分化:部分高校拥有稳定的学科定位,而其他高校则缺乏这种条件。一些学者不得不“隐性”地开展数字人文教学,可见作为一门课程,数字人文在学术体系中的能见度依然不高,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提升。部分受访者建议,应更加重视数字人文教学的推广与宣传,并突破单纯聚焦研究生层次的局限。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教学应从“中学毕业生阶段”便可以开展,且应当展示数字人文如何帮助我们在21世纪创造与理解文化。

在中国,数字人文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从少数高校的博士与硕士项目,逐步扩展到本科课程的开设,例如内蒙古师范大学^①与内江师范学院^②等案例。受访者认为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一位学者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学科尚未完全建立,但需求已经出现,且似乎已经成为趋势的阶段。”不过,对于是否应开设数字人文本科项目,学界依然存在谨慎态度,这一点在“职业”一节中已有涉及。

部分院校正推动跨院系合作,开设跨学科的数字人文选修课,从而扩大受众范围。这反映了中国高校在制度层面对数字人文教育的逐步重视。中国学者描述了一种教学转向:从单纯的技术训练转向批判性思维与

^① <https://mxy.imnu.edu.cn/info/1179/2730.htm>

^② <https://wx.njtc.edu.cn/info/1030/54401.htm>

创造性应用的培养——“学生必须超越技术层面的训练,以创新的方式理解数字人文的应用”。目标是帮助学生突破学科边界,重构研究问题,并在更有学术意义的语境中应用数字人文工具解决问题。

中国受访者还强调了一些旨在拓展数字人文影响力的跨学科教育计划。这些计划常常通过开设跨学科选修课向不同学科学生开放,涵盖主题包括 GIS、语料库标注与大语言模型等。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已在本科到博士各个层级开展数字人文教育。一些中国学者特别强调,数字人文教学应将技术训练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相结合,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学习不应止步于对工具的掌握。同时,多位学者自编教材以适应本地需求和院校课程设置。这些教材不仅支持了正式课程,也为跨学科选修课提供了基础资源。这种注重课程设计的做法,体现了中国高校在制度上对数字人文教育本土化与规范化的积极投入。

目前,全球尚未建立数字人文教学项目的统一评估体系,这是教学领域一个重要缺口,而区域或国际合作或许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在正式课堂之外,培训——例如工作坊、暑期学校与联合授课项目——在中英两国均被视为必要,但对其有效性的看法不尽相同。英国学者频繁提及一些知名培训项目,但也有人认为,该领域需要一种介于一次性培训与完整学位之间的中间层次训练模式,即能够提供深度与持续参与,而不需投入完整学位周期的形式。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培训形式,但学者们担忧其受众有限,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类培训难以满足广泛需求。

(2) 应该教授学生的内容

英国和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强调跨学科性作为数字人文教育的基础的重要性。双方一致认为,学生必须在核心人文学科方面具备坚实的基础,同时接触计算思维和数字工具。英国学者往往强调需要对数字方法进行批判性参与,鼓励学生审视在进行人文探究时使用技术的认识论意义。中国学者同样倡导跨学科框架,但其重点更具实践性,主要在于弥合文化遗产研究、信息科学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联系。

双方都同意学生必须熟悉关键的数字工具和计算方法,但其强调点有所不同。英国学者通常强调教授数据素养和编程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更广泛的技能,例如数据管理、可视化和 GIS。中国学者同样重视数字技能的习得,但往往更注重本土实践中常用的工具集,例如古籍的光学字符识别(OCR)以及档案元数据的创建。

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数字档案和文化遗产是共同的优先事项,但在两种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英国,数字人文教育者常常将数字档案视为提出有关访问、策展和公共历史等问题的手段。而在中国,文化遗产往往被定位为国家记忆和身份的核心领域,数字人文培训则强调古籍和历史文献的数字化、保存和诠释。

英国和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提倡项目驱动的学习,认为这种方式能为学生提供将数字工具应用于现实研究问题的关键经验。英国学者将协作式、探究驱动的项目描述为数字人文教学的核心,通常涉及跨学科团队和开放式探索。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同样强调动手实践的价值,但往往将其融入与机构或政府优先考量的、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项目中。

英国学者非常重视在数字人文课程中嵌入伦理反思和批判理论。诸如算法偏见和数字殖民主义等主题,通常被视为帮助学生批判性思考数字世界的核心内容。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教学中较少将数字伦理或政治批判置于突出位置,尽管对于数据责任和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等主题的兴趣正在增长。

英国和中国的学者都认为沟通与叙事是数字人文学生的重要技能,尽管他们的方法有所不同。英国学者常常鼓励学生产出面向公众的成果,以便将研究转化为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内容。中国学者也认识到数字传播的重要性,但更注重数字人文如何有助于公众教育和国家文化传播。

5.9 计算转向

(1) 计算人文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文化与社会数据的日益普及,以及用于查询这些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工具的发展,人文学科正经历一场计算转向(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回归”^①)。与这场计算转向相关的术语和技术种类繁多,彼此交叠或互补——例如文化分析、远读、宏观分析、网络档案研究、文本与数据挖掘、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尽管其对主流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程度至今仍存争议。计算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大规模分析海量数据(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及/或视听媒体),从而发掘那些通过细读和定性方法难以察觉的语言、主题或历史模式。

数字人文为人文/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实验空间,用于探索计算方法及其影响:在英国,通过“与机器共生”和“屏幕档案智能系统”(ISSA)^②等项目,或如艾伦·图灵研究所《人文与数据科学白皮书》等报告;在中国,则有哈佛大学 CBDB 项目、莱顿大学的 MARKUS 项目与台湾大学的 DocuSky 项目展现了计算数据建模与分析的范例。

中英两国受访者均指出,计算工具、方法及基础设施的普及化既是近年数字人文的核心趋势,亦是该领域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两国关注重点略有差异——例如英国更侧重语料库语言学,中国则更注重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但双方均高度关注如何使计算方法更广泛地惠及数字人文及更广阔的人文领域研究者,并日益深入探讨这将如何重塑未来人文研究的实践方式。

英国国内对数字人文日益被先进计算方法所定义的现象存在复杂情绪,认为其与定量方法的关联过于紧密(至少在大众人文认知中如此),部分人士担忧大规模高计算量项目的资金支持可能逐渐取代采用定性方法的小型项目。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数字人文(乃至更广泛的人文领域)亟需更深入地探索计算与人工智能方法的潜力(及风险)。部分受访者指出,原生数字研究(如网络档案研究)正逐渐成为人文学科的主流,这为运用社交媒体及其他跨媒体或数字文化形式研究当代文化开辟了新路径。

计算相关主题的教学呈现相似趋势。英国学者高度重视在数字人文课程中融入伦理反思与批判理论,算法偏见、数字殖民主义、无障碍访问及开放获取等议题常被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数字世界的必修内容,这体现了“批判性数字人文”话语的广泛倾向。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教学中较少突出数字伦理或政治批判,尽管部分学者对数据责任、数字权利及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等议题日益关注。中国教学更侧重实践成果——例如数字人文如何支持文化产业、经济创新或国家教育目标。但中国学者正逐渐意识到融合全球视角与批判性反思的必要性,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趋同趋势。

(2) 大规模数据与集合

受访者强调,分布于人文研究项目、GLAM 机构以及创意产业或公众产生的其他数据源中的文化与社会数据,蕴藏着巨大且尚未充分发掘的潜力。

在中国,GLAM 机构拥有海量文化数据,但数据开放共享的缺失已成为 GLAM 机构与学术研究组织开展合作的主要障碍。在英国,我们研究中的部分文化遗产代表认为,数字人文领域已基本建立了查询这些内容的下游技能和方法,但仍然缺乏的是对研究和文化生产原始材料(海量数据)的访问权限,这将使更复杂的跨

① 感谢阿里安娜·丘拉(Arianna Ciula)对此的洞见。

② <https://livingwithmachines.ac.uk/>, <https://www.kcl.ac.uk/research/issa>

馆藏和跨领域分析成为可能,无论是近距离还是大规模分析。

“与机器共生”项目汇聚了数据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融合多种计算方法(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历史语言使用趋势,并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地图特征进行分类,借助海量历史报纸集和空间数据来探究工业革命。该项目被视为数字人文与 GLAM 领域协作的典范,有望为此奠定基础。

我们采访的 GLAM 从业者一致认为,近年来英国的 GLAM 与数字人文研究议程已显著趋同,双方共同关注如何使档案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大规模数字化藏品既更便于研究,又能更贴近受众需求。在国际层面,OpenGLAM、“藏品即数据”以及开放文化数据运动(常借助博物馆 API)在此方面提供了关键参考。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迈向国家收藏”(TaNC)研究计划在探索如何创建统一的数字化文化遗产收藏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不仅提升了基于藏品的工作流程与数据的互操作性,更彰显了其价值所在。

(3) 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

人工智能研究在英国和中国均呈增长态势,但从(数字)人文学科视角来看,其侧重点有时存在差异。尽管人工智能并非本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受访者普遍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推动文化实践的快速变革,数字人文很可能在关于如何适应这些新现实的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围绕教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政策正推动着数字人文研究发展。这与“建设数字中国”、促进数据资产化等国家战略目标相契合,间接惠及数字人文领域。不过,中国研究也高度关注文化遗产与传统资源,例如古籍文献。

有人认为,数字人文领域理应更深入地与人工智能展开对话,但该领域总体上尚未完全适应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人文学科普遍缺乏对人工智能运作机制、功能作用及其对社会文化实际影响的深入理解,因此有人认为“数字人文在消除恐惧与焦虑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能帮助人们真正理解人工智能的实际功能”。部分中国学者通过大型语言模型优化应用,认为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对数字人文的影响显著:既降低技术门槛,又促进模型与研究的深度融合。他们强调人工智能在提升研究效率方面的潜力,尤其体现在处理海量文本和揭示关联性方面——这仍是数字人文的核心优势。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英国,数字人文学者更倾向于积极批判人工智能,或探索人工智能的偏见、伦理和法律问题;而在中国,人工智能的整合正被更积极地推进,机构层面对于人工智能在促进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也表现出更强烈的热情。然而两国均存在质疑声音:尽管人工智能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其效果存在被“过度夸大”的风险——有学者指出,对于人文学科领域而言,“人工智能与大型语言模型目前根本不适用”。两国均对人工智能对(数字)人文学科研究议程的影响存疑——担忧其未来可能主导学术与资助议程。

目前,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学生如何与 GPT 互动的关注度自然很高,但一些英国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包括倡导更民主的人工智能工具获取渠道,代表多元声音,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融入人文价值。还需确保“由艺术与人文学者需求驱动的机遇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突破边界”,而非简单接受通用型和“开箱即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尽管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具被公认为具有价值,但两国受访者均认为,目前许多人文学者缺乏有效运用这些工具的培训或跨学科技能。

在实践层面,英国受访者指出需构建大规模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并让高性能计算更广泛普及——为不熟悉此类工作方式的研究者搭建“入门通道”,并提供“手把手指导”,以帮助其驾驭新颖且复杂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受访者一致认为数字人文虽仍以实践为主导,但亟需建立理论框架——尤其在人工智能、伦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迫切需要基于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支撑,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方面”。

最后,随着技术日益精进,我们理解其运作机制与影响预判的能力反而减弱,这将成为数字人文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此类项目往往需要由大批高度专业化(且多为技术型)研究人员组成团队,这将催生截然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模式。

5.10 知识生产与成果

(1) 数字人文与知识生产

在本节中,我们询问受访者数字人文如何创造新知识。数字人文学者常难以用既能获得领域共识又能被更广泛受众理解的方式阐明这一点,但我们认为提出此问题至关重要——既可理解该领域对自身知识生产角色的认知,又能发掘跨越地理文化边界及数字人文子领域的共同脉络。总体而言,两国受访者的回答呈现相似性。

(2) 建构

英语数字人文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建构”,尽管围绕其内涵(以及这种建构行为需要多大程度的技术性)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英国受访者对此有特别体现,他们确认了对数字人文更广泛的理解,即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其核心在于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基础设施,这与大多数人文学科姊妹学科中的研究相比具有“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

中国受访者同样认同数字人文普遍被视为知识生产者,强调其揭示隐性规律、创造新方法论、拓展学科边界的能力。但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人文更侧重知识重组与发掘,而非创造全新洞见——它属于“方法论的转变、范式的转换”,是“催生新知识的助产士”。它不会直接创造知识。

(3) 空间

两个研究群体的参与者都指出,数字人文常处于一种临界空间,由此既产生优势也带来局限。正如一位中国受访者所言,尽管在合作项目中定义或获得数字人文对知识的独特贡献往往面临挑战,但**创新行为常发生在学科边界处**。

至少一位英国研究参与者认为:“若想从事激动人心的工作,并理解我们周围(文化空间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绝对是值得投身的前沿领域。”

(4) 生成关于人文学科实践的元知识

英国部分学者特别强调数字人文如何创造元知识,即关于知识如何被构建、生产和传播的知识。这种解读认为,通过档案数字化、文本编码或数据库设计,学者们被引导批判性地反思传统范畴(如作者身份、体裁或分期)中内嵌的假设。数字方法不仅用于内容分析,更用于质疑既有的学术框架。这种反思性维度是许多英国学者理解数字人文智识贡献的核心所在。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往往通过数字项目中的分类体系或本体论构建,以更隐性方式介入元知识领域。其重点在于为当代需求标准化与现代化传统知识体系,对学科范式的批判性反思相对隐晦。简言之,英国学者更常凸显认识论的颠覆性,而中国学者则着重强调认识论的系统化与整合性。

(5) 实现多模态与跨领域的知识形式

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均指出,对文本、图像、声音及空间数据等复杂组合进行整合分析,是数字人文对知识创造的独特贡献。在英国语境中,这种跨学科性(有时伴随多模态性)常与学科边界的消解相关联,从而促进人文科学、计算机科学、设计与信息学之间的协作。当文学通过视觉化手段解析、艺术史融入空间分析、表演研究借助数字媒体记录时,新见解便应运而生。中国学者同样推崇跨学科与多模态方法,尤其在遗

产研究及互动展览领域。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通过3D扫描、虚拟模拟等可视化手段,更易于学生、年轻群体及公众所获取理解;而英国学者则倾向将多模态形式视为激发多层解读的实验性尝试。由此可见,两种语境虽均重视多模态的实现可能性,但对其认识论功能的界定存在差异。

(6) 数字人文应扮演辅助角色还是自主角色?

两组受访者均认为,数字人文并非单纯将技术应用于人文学科,而是对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共享与想象方式的重构。然而,受访者(在各国范围内)对数字人文的核心定位存在分歧:究竟是主要支持人文学科的转型,还是应当开创自身独立的研究议程。

尤其在英国受访者中,一种日益强烈的共识正在形成:数字人文需要在数字研究的关键挑战中展现领导力。这些挑战涵盖从实践考量到多样性与包容性等诸多方面。实践问题包括项目与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新兴研究对象的引证规范,以及隐性劳动的认可。多样性挑战则涉及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者,或在数字研究平台中加强多语言支持(尤其是非英语数字人文领域)。

一位受访者指出:“当前普遍问题在于数字人文本质上仍受英语霸权支撑”,且缺乏全球南方地区的代表性。部分中国学者强调需积极参与学术话语,批评那些缺乏学术深度、仅以资源为导向的合作模式。他们同时指出:“中国自身基础设施尚未充分整合,与全球项目的联结也较为有限”。

(7) 重新思考作者身份、合作关系与人文知识的公众性

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学术作者身份与合作模式的转型。英国数字人文学者常强调从个人创作转向团队协作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汇聚了图书馆员、开发者、设计师与学者。这种协作模式既被视为实现知识生产民主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共同署名、开放同行评审和参与式档案建设的契机。中国学者同样认可协作的重要性,尤其在高校研究者、政府部门与科技企业协同推进的大型国家级项目中。但中国语境下的协作更多聚焦于机构协同与项目管理,较少强调作者身份转型或公众共创。“人文公众”概念亦存在差异:英国学者常倡导通过数字叙事或公民科学将数字人文作为学术界与多元受众的桥梁,而中国学者则更侧重向广泛公众传播权威文化知识(且多为教育导向型)。这凸显了双方对数字人文社会参与及知识民主化的不同愿景。

(8) 分析尺度与计算人文

英国和中国数字人文学者均认同,数字人文使学者能够提出新型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源于超越传统人文方法的计算能力。英国学者强调数字工具如何基于大数据集、网络分析和空间映射构建假说,进而重塑人文探究的本质。这些方法不仅拓展了分析尺度,更促使学者在数字环境中重新审视证据、语境与意义的构成。中国学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通过处理海量历史文献或文学语料库,支持着新型研究——使学者得以发现隐性趋势、词汇演变及地域差异。然而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常聚焦于运用这些工具探索古典文本、地方志与遗产数据,旨在深化文化解读而非审视数字认识论本身。因此,尽管双方都重视计算创新,英国学者往往强调批判性方法的开发,而中国学者则侧重拓展文化与历史研究能力。

(9) 数字人文与“巨大挑战”

部分英国受访者指出,科学界在聚焦全球性挑战(如大流行病、环境或粮食供应)并阐明其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这被某些人视为值得效仿的典范。他们认为数字人文目前尚未充分关注此类议题,但数字人文在诸多领域“具备独特优势”,例如虚假信息问题,以及理解数字生活对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一位拥有资金筹措和数字服务领域背景的受访者表示,若参加数字人文会议,他们预期会听到“大量极其具体的项目”,且“内容都非常细碎”——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人文学科研究往往如此运作。但同时,他们也质疑数字人文能否找到方法,将项目、方法和出版物串联起来,以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在重大挑战的背景下讨论数字人文。”

(10) 规划人与技术的关系

正如我们所见,数字人文在倡导、构思和评估新型研究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致力于超越人文科学与新技术及科技产业之间历史上的被动关系,转而展现人文科学在伦理、设计和批判性分析等领域的价值。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应更积极地与产业界互动,并展示其价值。它对诸多议题都有所论述,从文化物件建模或数字技能与素养,到数据采集的伦理、权力动态与数字基础设施。英国学界领军人物强调,英国数字人文必须避免沉溺于过时技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未能推动人文学科同步进步”,需持续探索前沿技术并叩问:“它能为我们创造什么价值?”在此愿景中,数字人文赋予艺术与人文学科更大自主权,使其能主导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及其在文化社会的应用。

中国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不仅是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更是对数字时代知识创造、共享与想象方式的重构。过去中国数字人文发展侧重文本与数字化,尽管数字化仍具重要性,但当前对人工智能与大型模型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结论

总而言之,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数字人文都被视为能在方法论、基础设施、多模态及认识论等多维度催生新知识。但两国也存在差异,这反映了各自更广泛的制度、历史与文化背景。英国学者常将批判性反思、方法论多元主义及公众参与置于核心位置,而中国学者则更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与国家层面的应用实践。

5.11 关系与协作

在本节中,我们询问受访者最常与哪些国家开展合作,他们如何看待本国(英国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以及未来希望看到全球代表性产生哪些变化。

中英两国数字人文学者虽身处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与政治生态,却都深度融入全球研究网络。双方对实质性国际合作的前期期许显而易见,对系统性挑战的共识亦然——从资金支持、人员流动到理念契合与政策碎片化。英国学者倾向于灵活、个人主导且以资金为导向的合作模式,而中国学者则更重视机构声望、地域邻近性及结构化合作。但双方都日益意识到,数字人文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能力,更需跨越文化差异,推动可持续的跨国伦理合作。

(1) 主要合作国家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中国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者,其合作对象都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英国学者而言,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尤为突出,有时还得到欧盟资助项目(如“地平线计划”)的历史性支持。英语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共同语言与文化纽带常为合作提供便利。部分学者特别强调与爱尔兰数字人文领域的联系——当地资助机构^①的专项合作计划依托既有纽带开展,受益于某位学者所称“大学运作模式的共同文化历史”。而英国数字人文领域通过联合专业协会与爱尔兰建立的战略联系,更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学者同样将英美视为主要国际合作对象,尤其体现在联合研究、教学及出版领域。德国及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虽在中国受访者中有所提及,但重要性不及英国数据集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特别提及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作为关键的亚洲合作伙伴,体现了地理邻近性和共同的区域学术利益——这一轴心在英国的回应中鲜少出现。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也被中国学者提及,凸显出横跨中亚和东

^① <https://research.ie/partnerships/uk-research-and-innovation-ukri/>

亚的更广泛区域网络。

(2) 合作的形式与类型

在合作类型方面,中英学者均开展学术研究、合著出版、科研交流及会议参与活动。对英国学者而言,正式合作往往源于资金驱动的机制,例如参与欧盟项目或依托联合机构框架开展的跨国合作。相较之下,中国学者更侧重合著专著、联合培养人才,以及共享数据库和谱系资源等科研基础设施。中国受访者还提供了更多机构主导的合作范例,如政府主办的学术会议(例如世界古典学大会),并常将声望、机构支持及契合国家战略列为主要驱动力。

英国学者则倾向于建立个人或院系层面的伙伴关系,这些合作往往基于学者流动性、历史渊源或个体层面的共同研究兴趣。他们描述的合作关系是通过共同的知识论或国际学者在英国机构的存在而自然形成的。虽然两组学者都参与会议和研讨会,但中国学者更常将这些活动置于正式的机构协议和政策驱动的倡议框架内,通常有国家支持。

(3) 合作的障碍与挑战

两组学者均指出**地缘政治因素、制度壁垒和结构性限制**造成的局限性,但侧重点不同。英国学者着重探讨脱欧后的影响,包括欧洲资金渠道中断、签证问题以及跨境合作面临的官僚制约——尽管近期事态发展带来更多乐观因素,且该领域与欧洲的关系依然稳固。他们同时提及**全球碎片化带来的冲击**,并担忧长期合作日益困难,尤其在政治动荡国家。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旅行限制、机构惯性、领导层共识缺失以及中西方机构开放程度不均等障碍。具体错失的合作机会——例如与英国某知名 GLAM 机构的合作失败——被提及时流露出些许遗憾,关于其他国家的反馈较少。英国学者承认因基础设施与知识体系差异导致与全球南方合作有限,而中国学者提及俄罗斯及中亚为合作对象,但这些关系被描述为不平等或流于表面。

(4) 关于全球数字人文结构与公平性的思考

英国学者对全球数字人文领域中权力不对称现象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觉认知,并强调有必要建立非剥削性、公平的伙伴关系——尤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但这种认知并未始终体现在机构政策中。他们批判性地反思传统合作模式的局限性,呼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人文网络,有时特别强调跨越语言与文化鸿沟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同样表达了深化合作的意愿,但指出政策协调缺失与内部碎片化构成阻碍;普遍认为**国际伙伴关系仍多停留在交易层面且由精英主导**,缺乏深度融合与持久性。英国受访者从全球视角探讨数字人文的学科伦理;而中国受访者则常聚焦于操作障碍与机构协调问题,表明尽管存在全球参与的愿望,实际操作与政治现实却制约着落地实施。

(5) 地缘政治对协作动态的影响

英国和中国学者均承认地缘政治对国际数字人文合作的影响(包括限制)。对英国学者而言,尤其是英国脱欧使其与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人们日益担忧民族主义政治抬头和国际主义式微将如何影响学术合作。尽管面临逆风,仍有学者期待高校能继续发挥跨文化桥梁作用。而中国学者则忧心西方日益加剧的限制与国内机构的犹豫态度,指出合作往往停留在纸面或象征性交流层面。因政治变动导致合作中断的案例(如部分美国合作项目的终止)表明,即便双方存在合作意愿,内外政治因素仍会共同阻碍深度融合。

5.12 超越学术的协作

(1) 与 GLAM 领域的合作

数字人文领域历来与 GLAM 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遗产领域保持着紧密联系。本研究中的学术界与

GLAM 受访者均证实了英国境内这种联系的牢固性,同时承认双方存在不同视角。以博物馆领域为例,受访者认同双方在公众参与及博物馆如何“通过数字化方式与观众互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更广泛而言,数字人文学者与 GLAM 从业者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可及性及数字藏品保存等议题上具有共同的研究焦点。文化遗产机构正通过“藏品即数据”运动^①等举措,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以释放藏品潜能,这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空间。

在英国,一系列因素共同营造出跨利益相关方文化遗产研究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信心日益增强的环境:主要文化遗产机构内部技术团队的壮大;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正式认可独立研究组织(IROs)为可获得基础设施资助的实体;^②与文化遗产合作伙伴建立联合博士生导师机制;以及设立支持图书馆专业人员制定研究议程的奖学金项目。^③在这一新格局下,部分 GLAM 从业者在合作对象选择上更趋审慎(“我们不会简单地把数据交给他们[……]我们自有团队可开展研究”),并日益渴望摆脱“单纯服务提供者”的定位,成为平等的研究协作方——其合作伙伴需“理解我们是与他们共事,而非为他们工作”。

我们访谈的文化遗产从业者认可数字人文的价值,但普遍不自认为是数字人文主义者,部分人认为当前形态的数字人文有时“过于小众”。一位受访者指出,数字人文虽能为文化遗产领域提供诸多有价值的框架,但这些框架往往难以被博物馆从业者、档案管理员或图书馆员所察觉。

数字人文与 GLAM 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双方对创新的定义存在差异,产出成果对各自领域晋升与声誉的影响不同,理论与实践的平衡问题,以及支撑数字工作的技术文化差异(例如对 GLAM 机构而言,构建稳健可扩展的基础设施优先于实验性探索)。GLAM 领域还面临更广泛的挑战:小型及非 IRO 资质的文化遗产机构在资金获取方面处于劣势;亟需增加投入以消除档案、访问权限及授权中的偏见;需提升 GLAM 从业者各类研究型角色的可见度——这些领域均蕴含着数字人文的贡献潜力。

中国 GLAM 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数字化提供基础数据资源,还建立了若干高知名度的数字人文项目。从协作角度看,图书馆与学术界合作较多,尤其在信息技术和出版行业。但博物馆与学术界的数字人文合作相对较少。部分学者认为这源于博物馆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的保守立场,以及实践应用的缺失:“博物馆从业者热衷讨论知识图谱,却苦于实际操作”。关于未来职业发展,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人才培养应侧重为图书馆和博物馆输送人才,尽管“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数字人文就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博物馆则相对滞后,这为拓展博物馆领域的数字人文能力和创新提供了机遇”。

(2) 超越学术界/与商业领域的合作

数字人文研究者与商业领域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在访谈中重点关注了具有数字人文合作经验的中小企业。正如该领域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存在对商业伙伴的“某种疑虑”,但研究反馈表明数字人文与商业领域存在建立更紧密、更深入、更多层次合作关系的潜力。人们普遍认为可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出版业(“这如同垂手可得的机遇”);软件公司(数字人文可展现其“理解系统构建逻辑及识别有益新功能的能力”);媒体公司(基于对文化社会数据的处理经验,数字人文“应参与媒体公司的决策讨论”);政策制定机构(需证据支持与趋势分析);以及任何涉及内容或档案的企业。一位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应“更积极地拓展影响力”,通过提供实习岗位、赞助机会或设立研究员职位等途径,加强与商业领域的联系,促进人才双向流动——鼓励行业人士转向人文科学领域发展。

① <https://collectionsasdata.github.io/>

② <https://www.ukri.org/publications/organisation-eligibility/research-organisations-eligible-for-ukri-funding/>

③ <https://www.rluk.ac.uk/prof-practice-fellowships/>

受访者中不乏在小型机构工作的学者,他们常对数字人文领域的进展充满热情,却普遍认为英国现行资助模式过于严苛。这种困境源于多重因素:部分项目资金捉襟见肘;人文学科研究中项目管理文化薄弱(尽管“高校在这方面正逐步改进”);审批周期冗长;多数申请成功率统计学上偏低;为提升项目获批率需提前承诺改进方案,却面临项目启动前难以界定成果的困境(亟需完善需求分析机制/加强设计阶段把控)。一位受访者建议,资助方案应考虑“为原型阶段探索性研究提供小额资金”,并使成功标准“真正透明化”。显然,数字人文领域应更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并协助制定战略。

中国数字人文与商业公司的合作主要体现在联合建设中心和共同开展项目。部分受访者认为基于商业伙伴关系的项目往往更具成效且技术专业程度更高。如前所述,数字人文学者亦通过此类合作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或获取研究资金。商业机构同样试图将数字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商业化,中国 CBDB 项目的商业化实践即为典型案例。对此现象,部分学者持积极态度,另一些则保持审慎。

5.13 全球可见度

(1) 全球舞台上的可见度感知

总而言之,英国数字人文界虽享有语言优势和历史积淀等结构性优势,但在建立集体认同和实现持续包容性方面仍有待努力。相比之下,中国数字人文界面临着语言文化差异、机构碎片化等显著的内外障碍,但已显现出发展势头和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尽管起点不同、面临挑战各异,两个学术社群都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争取更广泛的认可。正如两地学者共同构想的那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数字人文未来,需要通过加强互学互鉴、促进结构性公平、尊重多元认识论文化来实现。

英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数字人文社群在国际上可见度高,尤其相较于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这种可见度源于英国深厚的数字人文历史根基、英语作为学术通用语的主导地位,以及在数字人文联盟(ADHO)^①和欧洲数字人文协会(EADH)^②等重要学术会议与组织中长期活跃的参与。然而部分英国学者指出,这种可见度往往体现在个体研究者而非凝聚的学术机构或国家层面的学术共同体,这限制了国际社会对英国数字人文领域统一性的认知。

相较之下,中国数字人文学者对其全球可见度持更复杂的态度。尽管承认国际认可度提升——例如社交媒体曝光度增加及参与全球数字人文活动的增多——多数学者仍认为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有限。主要障碍包括语言差异、英语出版物不足以及国际数字人文机构中的代表性薄弱。中国数字人文常被视为困于“局域网”,凸显其与全球学术界的融合有限。部分学者援引国际认可的成功案例作为未来参与的范本,但同时强调发展独特的中国数字人文声音的重要性,而非简单迎合西方标准。尽管存在差异,英国和中国学者都对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数字人文对话表现出兴趣,这种对话是在更广泛的呼吁框架下展开的,旨在更充分地体现非西方视角。

(2) 语言与交流

语言问题成为中国数字人文学者面临的核心结构性挑战。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学者产出的英文研究成果稀缺,以及难以翻译中文学术概念中的微妙差异,阻碍了学术可见度与相互理解。并普遍存在一种认知:由于语言与文化鸿沟,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常被误解或低估。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主要障碍在于双方缺乏充分理

^① <https://adho.org/>

^② <https://eadh.org/>

解,我感觉外国学者对我们信任不足。”

这一问题在英国回应中基本缺席,反映出英语研究的结构性优势。我们的研究对象掌握多种语言(受访者常用的语言达十种),这表明尽管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交流和出版中英语占主导地位,但仍存在隐性的多语言潜力。英国学者承认语言优势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用。然而,尽管众多英国学者具有多元国籍和多语言背景,语言因素在英国数字人文讨论中却鲜少凸显——这种隐性反差展示了数字人文可见度与语言霸权相关的全球性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或推广语言及多语言主义的学科(如现代语言学、区域研究与语言学)历来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根基深厚。近期研究(Nilsson-Fernández et al., 2024)致力于推动英国与爱尔兰的多语言数字人文发展,其部分基于过去的数字人文项目,旨在促进对两国境内其他语言(如英国境内的爱尔兰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及苏格兰盖尔语)的数字化研究。

英国和中国的部分数字人文学者同样关注资源匮乏语言在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中被边缘化的问题。两组学者均指出资源限制、技术偏见和协调不足等系统性障碍,但基于不同国家背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诠释。英国学者着重于克服英语主导工具和政策中固有的文化偏见,而中国学者则着重强调技术缺口(如字体库、输入法或分词算法)及区域差异对低资源语言的影响。英语作为国家语言及技术工具默认语言的双重主导地位,使其他语言在英国数字人文话语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而多语言项目的战略视野与资源匮乏更使问题雪上加霜。

中国学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优先服务于主流语言——汉语普通话,而少数民族语言面临巨大挑战。他们认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可成为语言包容的催化剂,但强调目前该领域在支持藏语、壮语和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仍显不足。尽管在方言研究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努力仍规模较小且协调不力。中英两国学者均认为,通过加强协调并投资于多语言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可为提升语言多样性创造机遇。

多位学者关注数字人文能否切实惠及资源匮乏的语言,例如通过“促进方言、古典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与研究”,搭建促进跨语言对话的共同平台,并探讨人工智能与大型语言模型的兴起将如何增强或削弱对其他语言及变体的支持力度。

5.14 中英合作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发掘中英两国数字人文研究者深化合作的机遇。在最后部分,我们询问了参与者与“对方”国家数字人文研究者的合作程度、对这类合作整体情况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认为未来中英合作的主要机遇所在。

正如我们所见,由于该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学者往往比西方学者更了解西方学术动态。例如,某英国期刊主编指出,尽管其期刊三分之一的投稿来自中国研究者,但由于两国学者缺乏互动、协作与互鉴的机会,他们仍感到与中国知识生产文化存在隔阂。目前尚未出现类似欧洲层面的“研究议题与兴趣领域的校准”机制,例如通过 DARIAH 和 CLARIN 合作项目实现的协调,也未对不同研究优先级进行严肃评估,更未深入探讨跨文化认知挑战。

英国学者认为与大陆的合作有限,且往往发生在个人层面而非通过正式的机构框架。部分合作关系由在英留学的中国学生发起,他们毕业回国后双方仍保持着非正式的研究联系。英国学者虽认可合作潜力,但指出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地区与英国机构的互动更为活跃。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强调双方沟通不足与相互理解有限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承认合作尚处萌芽阶段,但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1) 挑战

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对双方都是重大挑战。在英国,极少数字人文研究者具备足够的中文水平,能够达到开展严肃研究所需的有效沟通程度。英国学者指出,当前大多数合作仍依赖中国研究者的英语能力。此外,中文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英文译介仍相对匮乏。

中国数字人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将英文数字人文书籍或教材翻译成中文。然而反向而行时,鲜有中国数字人文著作被译成英文或以英文出版,这阻碍了其更广泛的影响力。部分受访者建议,若能成立专门机构专注于将中国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将显著提升其可见度:“若能成立专门机构将中国数字人文成果翻译传播至西方,我认为这将是更快捷的途径。”

机器翻译工具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鸿沟——至少能实现文本的表面互译,但它们无法解决文化差异乃至所有语言挑战,短期内亦难以突破此局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设想的跨语言研究与分析(有时涉及比较翻译方法),即使是数据驱动型工作,也要求研究者对所有相关语言具备极高的语言理解力和文化认知力。

政治关切

政治与行政问题同样被提及——不同国家及机构的政策要求影响着旅行自由、信息获取、开放获取、隐私保护或敏感数据共享,这些都被视为潜在障碍。政治环境同样限制了可探讨的当代议题范围,并引发担忧:政治干预可能扭曲研究进程或结果。两组学者均承认政治挑战存在,但表述方式不同:英国学者侧重伦理关切与数字生态系统的限制,而中国学者则强调政策驱动的限制因素。

资金支持

两组学者均认为跨国资金渠道的匮乏是关键障碍。英国学者指出缺乏种子资金或制度激励来支持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而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合作或学术交流面临的后勤挑战,主要源于有限的财政资源。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既被视为挑战,也蕴含机遇。英国学者指出,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可丰富数字人文研究,但承认因学术文化规范差异导致优先事项难以协调。中国学者则更积极地将文化差异定位为互学互鉴的契机,同时意识到中国国内内向型的沟通方式可能阻碍与国际伙伴的主动合作。

数字生态系统与访问

数字生态系统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协作难度。英国学者指出,西方常用的平台在中国访问受限,导致沟通与研究传播受阻。中国学者则强调数据安全问题及限制跨国合作的政策。一位英国受访者观察到,研究人员根据所在地域可获取不同资源:“我们谈论数字世界,但实际上存在多个数字世界——并非所有人都能使用相同的基础设施和数据”。与此相关的是,“涉及数据及数据共享的不同基础体系或法律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2) 机遇

英国数字人文项目中有大量中国籍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这为探索中英两国在教学与研究领域双向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绝佳且尚未充分利用的机遇。

技术获取

在技术领域,本研究发现两国存在诸多合作契机:双方均拥有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和快速的技术发展速度(尽管发展方向未必一致,这恰恰蕴含机遇),且对计算人文科学及人工智能相关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展现出浓厚兴趣。

文化遗产/共同历史

英国受访者指出,围绕文化遗产项目或共同历史开展合作存在重大机遇。部分人士提议利用数字工具创造全新参观体验,并推动文化数据的普及化,尤其考虑到英国拥有大量中国历史文物藏品。他们认为在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或跨文化语境下的观众行为方面开展比较研究具有潜力。一位英国 GLAM 机构受访者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GLAM 参与模式差异正是值得深入比较的范例:“真正引人入胜的是[探究]双方在‘如何引导观众参与遗产活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根本性认知差异,以及从文化遗产资产中提取哪些重要内容”。中国快速的技术发展也被视为知识交流的领域,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方面。

中国学者同样强调知识交流的潜力,指出英国机构拥有宝贵的专业知识、标准和成熟的研究团队,可为合作提供指导。他们视数字人文为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桥梁,能推动以数据驱动的东亚文化统一研究。数字化方法被视为打破传统壁垒、促进跨文化理解的途径。

双方均认同文化遗产保护与技术创新是核心合作领域。但英国学者侧重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开展联合项目,中国学者则聚焦运用数字人文整合区域研究力量,并借鉴英国的研究方法论。

建立机会网络的价值

两国受访者均认为,未来深化合作的关键条件在于建立更灵活的学术网络,使中英两国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平等交流,避免任何一方的知识生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多位受访者建议设立高校专项计划,以支持此类学术联系与网络的建设。

6 结论/建议

在本报告中,我们呈现了中英两国数字人文领域相关方对自身、所在领域及彼此的认知概览。我们并非旨在全面描绘每个研究群体的全貌,而是着眼于识别共同点与差异点。在此过程中,我们试图勾勒出两国未来深化合作所面临的激励因素与阻碍因素。

我们不打算提出最终建议,而是希望未来能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合作实践。不过,基于对研究反馈的解读,我们在此提出若干潜在行动要点或重点关注领域。

总则

- 鼓励高校、GLAM 机构与产业界围绕文化与人文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开展合作。
- 游说资助方和专业组织支持针对特定研究主题的探索性网络计划种子基金,此类计划可纳入非学术合作伙伴。
- 鉴于受访者指出缺乏与对方国家人士互动的机会,可围绕共同的历史文化事件(例如中英两国可选鸦片战争主题)举办开放式创意构思/黑客马拉松活动,邀请来自其他人文学科、GLAM 领域及政策机构的参与者共同探讨。

致研究者

- 一位受访者主张加强“主题与研究领域的协调校准”,以使之更接近欧洲层面的运作模式。通过两国机构间的虚拟研讨会公开展示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在各地点呈现简短的研究快照,随后就潜在研究合作展开头脑风暴。此类活动可考虑邀请文化遗产机构、资助方及政策制定者担任特邀演讲嘉宾。
- 制作双语案例研究,展示数字人文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以促进更广泛传播。

- 围绕促进两国研究者合作的主题,在学术刊物中策划专题特刊。
- 建立联合文献目录、术语表和分类体系,以展示潜在关联并弥合概念差异。
- 共同组织双语会议环节及协作主题联合活动、研讨会或学术会议。

致 GLAM 机构

- 围绕共同兴趣领域构建双语交互界面与叙事体验。
- 联合策划融合中英文化遗产元素的虚拟展览与数据集。
- 开发共享元数据与本体框架,促进跨境互操作性。
- 设计互动竞赛,激发两国在 GLAM 数据创新应用与比较研究方面的活力。
- 推动双边驻留项目或实习计划,助力 GLAM 专业人士探索数字创新与合作机遇。

致资助方

- 建立中英双边数字人文计划,初期旨在发掘并促进数字人文研究者与 GLAM 机构(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之间的小规模网络合作与研究协作。
- 设立小额种子基金(例如 5,000—15,000 英镑),用于支持早期合作或试点项目。
- 激励开放获取与开放数据倡议。
- 探索促进多语言研究的机制,涵盖两国所有使用语言。
- 长期支持建设可持续且具备跨国互操作性的研究基础设施。
- 为数字人文领域的新晋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培训与交流奖学金。

致大学管理人员

- 联合研究生学位项目。中英两国已设立数字人文硕士项目的高校可考虑开发数字人文联合研究生学位项目,以促进硕士与博士生的协同培养。
- 联合 GLAM 合作伙伴创建双边及多语种培训的联合暑期学校。
- 开发跨境导师计划,支持数字人文领域青年研究人员。

致教师及课程负责人

- 跨国课程比较旨在识别教学内容或方法论的异同。如何在宏观或微观层面有效促进不同国家数字人文项目的国际虚拟交流?
- 国际化课堂。英国硕士项目国际学生比例较高,但课堂中这一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建议采取措施主动发掘其价值,赋予这些声音在课程设计中更多话语权。
- 运用机器翻译与同届专业知识(例如英国数字人文硕士项目中中国学生比例较高),开展两国项目间的文献综述比较,探究特定数字人文方法或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

附录



请扫描二维码获取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包弼德,2017. 群体、地理与中国历史——基于 CBDB 和 CHGIS[J]. 量化历史研究,(1):213-246.
- 陈刚,2014. “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3):136-142.
- 陈静,2013. 历史与争论——英美“数字人文”发展综述[J]. 文化研究,(4):206-221.
- 陈静,2018. 数字人文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突围[J]. 文化研究,(2):171-185.
- 陈静,2018. 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J]. 山东社会科学,(7):59-63.
- 戴安德,姜文涛,2016.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其展望[J]. 赵薇,译. 山东社会科学,(11):26-33.
- 邓小南,2021. 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J]. 中国文化,(1):11-14.
- 冯惠玲,夏翠娟,梁继红,2024. 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
- 李斌,王东波,2020. 计算文献学的概念、范畴及前景[J]. 图书与情报,(1):31-38.
- 李友仁,宋迎春,2018. 北美与西欧的数字人文中国研究状况论析[J]. 山东社会科学,(7):54-58.
- 刘石,2022. 文献学的数字化转向[J]. 文学遗产,(6):10-13.
- 刘石,李飞跃,2021. 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J]. 中国社会科学,(2):61-83.
- 欧阳剑,2016. 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66-80.
- 潘威,2018. “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应对——走进 2.0 时代[J]. 云南大学学报,(6):80-87.
- 邱伟云,2020. 我国台湾数字人文研究进程(2009—2017)[J]. 图书馆论坛,(4):9-19.
- 孙鸣蕾,房小可,陈忻,2021. 图书情报档案领域数字人文研究综述[J]. 兰台世界,(4):117-121.
- 王涛,2015. 挑战与机遇:“数字史学”与历史研究[J]. 全球史评论,(8):184-201.
- 王晓光,2010. “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M]//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王兆鹏,邵大为,2020. 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8):180-129.
- 夏翠娟,2024. 数字人文的理论沿革和范式转向: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到“后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5):83-101.
- 项洁,涂丰恩,2011. 导论——什么是数位人文[M]. 项洁. 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位人文研究.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9-28.
- 徐力恒,陈静,2017. 我们为什么需要数字人文[N]. 社会科学报,2017-08-24(005).
- 徐力恒,王涛,2019. 数位人文:跨界与争鸣[M]. 蒋竹山. 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理论、方法与实践. 台北:联经出版:543-569.
- 严承希,王军,2024. 数字人文视角:基于符号分析法的宋代政治网络可视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5):87-103.
- 赵思渊,2017. 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中的数字人文方法与文献学本位[J]. 中国史研究动态,(5):46-49.
- 赵薇,2021. 数字时代人文学研究的变革与超越——数字人文在中国[J]. 探索与争鸣,(6):191-206.
- 张彬彬,朱青生,2024. 计算艺术史的方法和任务[J]. 美术,(9):8-20.
- 诸雨辰,2022. 自然语言处理与古代文学研究[J]. 文学遗产,(6):13-18.

西文文献

- AFANADOR-LLACH M J,2024. Las humanidades digitales y los retos de acceso a la cultura en América Latina [M/OL]// KRAFT T,ROJAS CASTROAND G A,QUINTERO T. Archivos abiertos: El patrimonio documental cubano y la transformación digital. Berlin: De Gruyter. <https://uplopen.com/chapters/e/10.1515/9783111187846-009>.
- ANON,2011.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OL]. Strasbourg: ESP. https://www.esf.org/fileadmin/user_upload/esf/RI_DigitalHumanities_B42_2011.pdf.

- CIULA A, ESPOSITO A, WIJAYA F, 2025. KDL checklist for digital outputs assessment [EB/OL]. <https://zenodo.org/records/15147897>.
- DACOS M, 2013. La stratégie du sauna finlandais [EB/OL]. <http://bn.hypotheses.org/11138>.
- FIORMONTE D, CHAUDHURI S, RICAURTE P, 2022. Global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IORMONTE D, 2012. Towards a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7(3) :59–76.
- GALINA RUSSELL I, 2014. Ge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J/OL].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9(3) :307–316. <https://doi.org/10.1093/lc/fqu005>.
- GAMBELL S, GOODING P, HUGHES L, et al. , 2021. Communicating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2.0) [EB/OL].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643727>.
- GIL A, ORTEGA É, 2016. Global outlooks in digital humanities: multilingual practices and minimal computing [M]// CROMPTON C, et al. *Doing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ce, training,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22–34.
- HOCKEY S, 2004.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M]// SCHREIBMAN S, et al.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rofessional: 3–19.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companion/>.
- KING'S DIGITAL LAB, 2019. Research software engineering roles [EB/OL]. <https://github.com/kingsdigitallab/sdlc-for-rse/wiki/Research-Software-Engineering-roles>.
- KING'S DIGITAL LAB, 2020. A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for research software engineering [EB/OL]. <https://github.com/kingsdigitallab/sdlc-for-rse/wiki>.
- MCCARTY W, 2012. The PhD in digital humanities [M/OL]// HIRSCH B D. *Digital humanities pedagogy: practices,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33–46. <http://www.openbookpublishers.com/product/161/digital-humanities-pedagogy-practices--principles-and-politics>.
- MCGILLIVRAY B, et al. , 2020.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ities and data science: a white paper from the Alan Turing Institute [EB/OL]. <https://www.turing.ac.uk/news/publications/challenges-and-prospects-intersection-humanities-and-data-science>.
- MURPHY O, et al. , 2023. Enhanc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capacity through collaboration: building a UK-Ireland digital humanities association [EB/OL].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204397>.
- NILSSON-FERNÁNDEZ P, SPENCE P, WELLS N, 2024. Multilingual DH in the UK and Ireland: summary report and future recommendations [EB/OL]. <https://zenodo.org/records/13683711>.
- NYHAN J, FLINN A, 2016. *Comput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towards an or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M]. Cham: Springer.
- RIANDE G DEL R, 2024. Acerca de la sostenibilidad, archivo y preservación de proyectos de edición digital de textos hispánicos [J]. *Philologia hispalensis*, 38(2) :41–57.
- RISAM R, 2017. Other worlds, other DHs: notes towards a DH accent [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32(2) :377–384.
- ROSS J, et al. , 2024. Infrastructure futures for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EB/OL]. <https://zenodo.org/records/13710266>.
- LIU S, ZHAO W, LI F Y, 2024. The world humanities report: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1980-2020 [R/OL]// The world humanities report. CHCI. https://worldhumanitiesre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24/07/Chi_8.3_Digital-Humanities-in-China-1980-2020.pdf.
- SPENCE P, 2021. *Disrupting digital monolingualism: a report on multilingualism in digital theory and practice* [R/OL]. London: Language Acts & Worldmaking projec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743283>.
- CHEN J, TSUI L H, 2022. Debating and developing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new or old [M/OL]// FIORMONTE D, CHAUDHURI S, RICAURTE P. *Global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1–8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Barriers in DH: A UK–China Case Study

Chen Jing Paul Spence Trans. Jiang Yunfang Zheng Xinyi

Abstract This report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landscapes in the UK and China,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45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cademics, funders, policymakers, and professionals across th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sectors. It offers the first large-scale, qualitativ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DH in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explores how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contexts shape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both shared challenges and divergent trajectories in DH development. While the UK has a longer tradition of DH institutionalisation—rooted in academic departments, project-based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China’s DH field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influenc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infrastructural ambitions, and an increasingly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environment.

Key findings include:

- Diverse understandings of DH

UK participants often view DH as experiment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ctice-based, while Chinese scholars describe a fragmented but rapidly growing field, often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pragmatic goals.

- Funding landscapes

In the UK, competitive, project-based funding is typical, with expanding support fo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engagement. In China, funding is more centralised and strategically aligned with government priorities, especially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smart technologies.

- Infrastructure gaps

Both countries face challenges in sustai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K stakeholders emphasise interoperability, diversity, access, and sustainability; Chinese participants focus on uneven developm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data standardisation.

-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paths

UK scholars have greater recognition of DH roles, though career progression for technical staff remains difficult. In China, DH identities are less formalised, and professional pathways are emerging but uncertain.

-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There is strong interest in UK–China collaboration, but barriers include linguistic divides, lack of shared platforms, limited cross-national funding, and epistemic disconnections in research practice.

The report concludes with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funders, researchers, universities, and the 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GLAM) sector to strengthen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build inclusive infrastructures, support emerging professionals, and fos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cross the UK and China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Key words UK–Chian comparison; digital humanitie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discipline; education